



上海外国语大学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硕士学位论文

(题目)

当代俄罗斯外交政策中的东正教因素研究

外交学

2023 届

贺鹏宇

学科专业

刘晓雪

届 别

姓 名

导 师

上海外国语大学
硕士学位论文

当代俄罗斯外交政策中的东正教因素研究

院系：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学科专业：外交学

姓名：贺鹏宇

指导教师：刘晓雪

2023年05月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A STUDY ON ORTHODOX FACTORS IN CONTEMPORARY
RUSSIAN FOREIGN POLICY**

**A Study On Orthodox Factors in Contemporary Russian Foreign
Policy**

By

He Pengyu

Under the Supervision of Professor Liu Xiaoxue

May 2023

答辩委员会成员

主席：高奇琦 教授 华东政法大学

成员：晋继勇 教授 上海外国语大学

张绍铎 副教授 上海外国语大学

张磊 副教授 上海外国语大学

摘要

本文是从外交文化的角度研究俄罗斯的外交政策，具体的落脚点是研究俄罗斯外交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东正教对俄罗斯外交政策的影响。

一个国家外交政策的制定与执行往往受到各种各样因素的影响与制约，对于外国特别是设立了国教的国家而言，宗教因素是一个不能被忽略的重要因素。自冷战结束以来，伴随着政治多极化的发展，认同政治也逐渐地登堂入室，并衍生出了全球性的宗教复兴现象；而与此同时，各类宗教团体也越发活跃起来，与政治生活的互动和交织逐渐蔚然成风；作为一种全新的外交形态，宗教外交正在而且将对国际政治产生越来越重大和深远的影响。然而通行的国际关系准则和一系列国际条约和协议却将宗教外交长期排除于外交体系之外，对于外交权力的探讨常常默认主体为该国的外交专职部门和职业外交官，对宗教之于外交政策影响的研究出现历史性缺位。

尽管美苏冷战格局已随着苏联的轰然倒塌而一去不复返，作为苏联主要继承国的俄罗斯仍然是当今国际社会中最为核心的国际行为体之一并在当今世纪扮演着重要的作用，特别是近年来参与国际事务的意愿不断提升，其外交政策的取向越来越成为国际政治领域的热门研究领域。作为对一个民族对外的思维定式和价值观的反映，外交文化具有相当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它就如同是一只看不见摸不着的手，会在不同的时期相对稳定地控制、影响着当时的外交政策和对外交往活动。

更深入地了解俄罗斯的国家外交文化，有利于我们更加深刻地解读隐藏于俄罗斯外交政策背后的精神因素，对于把握和预测俄罗斯外交发展趋势也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和意义。要对俄罗斯精神文化进行深入探究，宗教因素是一个绕不开的主体，正如西方的一句俚语所言：英国人和美国人会谈体育运动，法国人会谈浪漫，而俄国人则会谈论信仰和上帝，又如格林厄姆所言：“俄国人永远走在一个他们可能找到上帝的地方之途中。”在俄罗斯一千多年的对外交往史中，俄罗斯的外交文化既展现出了它的历史延续性，也具有独特的演变史，可以看出不同时代的积淀和变迁。作为俄罗斯的国教，东正教在俄罗斯外交文化中拥有特殊而又极为重要的作用。可以说是贯通俄罗斯外交文化的纲。只有深入地对东正教进行研究，才能对俄罗斯外交史和外交政策有更为准确的把握。

本文拟研究当代俄罗斯外交政策中的东正教因素，引入国际上已有的宗教外交理论，探讨国际政治中的外交因素：通过梳理东正教在俄罗斯的发展

历程，从结构维度和过程维度出发，解释东正教能持续影响俄罗斯外交政策的动因，展望俄罗斯政教互动的未来发展趋势，以及对我国外交工作的启发。

关键词： 俄罗斯；东正教；外交政策

Abstract

This paper is to study Russia's foreign polic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iplomatic culture, and the specific goal is to study an important part of Russian diplomatic culture—the influence of the Orthodox Church on Russian foreign policy.

The formul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a country's foreign policy is often affected and restricted by various factors. For foreign countries, especially those with established state religions, religious factors are an important factor that cannot be ignored. Since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political multi-polarization, identity politics has gradually entered the room, and has derived a global religious revival phenomenon; At the same time, various religious groups have become more and more active, and the interaction and interweaving with political life has gradually become a common practice. As a brand-new diplomatic form, religious diplomacy is and will exert more and more significant and far-reaching influence o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However, the prevailing norm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a series of international treaties and agreements have excluded religious diplomacy from the diplomatic system for a long time. The discussion of diplomatic power often defaults to the diplomatic professional departments and professional diplomats of the country, and the research on the influence of religion on foreign policy has been historically absent.

Although the Cold War pattern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Soviet Union has gone with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Russia, as the main successor of the Soviet Union, is still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international actors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nd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is century. Especially in recent years, the willingness to participate in international affairs has been continuously enhanced, and its foreign policy orientation has increasingly become a hot research field in the field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s a reflection of a nation's foreign thinking and values, diplomatic culture has considerable stability and continuity. It is like an invisible hand, which will control and influence the foreign policy and foreign exchanges at that time relatively stably in different periods.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Russia diplomatic culture is conducive to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the spiritual factors hidden behind Russian foreign policy, and also has important theoretical value and significance for grasping and predicting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Russian diplomacy. In order to make a thorough study of Russia spiritual culture, religious factors are an inseparable subject, as a western slang says: The United Kingdom and United States talk about sports, the France about romance, and the Russians about faith and God. As Graham put it: "The Russians are always on their way to a place where they might find God." In the history of Russia's foreign exchanges for more than one thousand years, Russia's diplomatic culture not only shows its historical continuity, but also has a unique history of evolution, which can be seen in the accumulation and changes of different times. As the state religion of Russia, Orthodox Church plays a special and important role in Russian diplomatic culture. It can be said that it is the outline of Russia diplomatic culture. Only by deeply studying the Orthodox Church can we have a more accurate grasp of Russia diplomatic history and foreign policy.

This paper intends to study the Orthodox factors in contemporary Russia foreign policy, introduce the existing international religious diplomacy theory, and explore the diplomatic factor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This paper reviews the history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Orthodox Church in Russia, explains the motivation of the Orthodox Church's continuous influence on Russia's foreign policy from the structural and process dimensions, and looks forward to the future development trend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church and the state in Russia, as well as the inspiration for China's diplomatic work.

Key words: Russia; Orthodox Church; foreign policy; religious diplomacy

目 录

导论.....	1
一、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1
二、国内外研究文献综述.....	2
(一)国内研究综述.....	2
(二)国外研究综述.....	4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总结.....	5
三、研究方法.....	6
(一)历史研究法.....	6
(二)归纳法.....	6
四、研究思路及论文结构.....	6
五、创新点与难点.....	8
第一章 宗教与外交:理念、内涵与具体影响.....	9
一、宗教与公共外交理念.....	9
(一)公共外交的宗教背景.....	9
(二)宗教外交的含义与特征.....	10
(三)宗教外交的内涵与机制.....	10
二、国际关系中的宗教因素.....	11
(一)拓展国家影响力的“旗帜”.....	11
(二)外交政策中的“路线图”和“粘合剂”.....	11
(三)增强国家软实力的可行手段.....	12
第二章 东正教在俄罗斯的地位和影响.....	13
一、东正教的产生与特点.....	13
二、东正教在俄罗斯历史中的变迁.....	14
(一)基辅罗斯时期.....	14
(二)沙皇俄国时期.....	15
(三)苏联时期.....	16
三、东正教对民族精神的影响及其在外交领域的体现.....	17
(一)救世主义的使命感.....	17
(二)权力崇拜的民族心理.....	18
(三)二律背反的性格特征.....	19
(四)忍耐受苦与尚武重战的习性.....	20
第三章 当代俄罗斯政治家外交背后的东正教因素.....	23
一、叶利钦时期外交背后的东正教因素.....	23
二、普京时期外交背后的东正教因素.....	24

第四章 东正教影响俄罗斯外交的现实表现	27
一、整合后苏联地区,保持意识形态主导	27
二、积极开展软实力外交,扩展在东正教世界影响	27
三、俄罗斯东正教会积极参与外交事务	28
第五章 东正教影响俄罗斯外交的根源分析	30
一、东正教自身发展的需要.....	30
二、现实政治的需要.....	31
(一)东正教是俄罗斯实施大国外交战略的精神支柱.....	31
(二)救世主义的使命感是对外政策争取民意的关键.....	32
(三)爱国主义情结是巩固意识形态防线的中流砥柱.....	33
第六章 案例分析——乌克兰危机中的俄罗斯	34
一、乌克兰危机爆发的东正教背景	34
(一)身份认同之争:弥赛亚意识与自我意识的冲突.....	34
(二)思想分道扬镳:莫斯科与基辅教会的分裂.....	35
二、俄罗斯行动背后的东正教因素	36
(一)“拨乱反正”:弥赛亚意识促使俄罗斯力阻乌克兰西化	36
(二)“横眉冷对”:受难精神和集权思想使俄罗斯藐视外部压力	37
第七章 挑战与对策	39
一、当前东正教影响下俄罗斯外交的困境	39
(一)宗教复魅背景下西方的渗透与和平演变风险.....	39
(二)弥赛亚意识对俄罗斯国际地位的负面影响.....	39
二、俄罗斯的应对措施.....	40
(一)重建俄罗斯思想	40
(二)巩固势力范围,拓展面向非西方的外交	41
结论.....	42
参考文献.....	43

导论

一、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俄罗斯是一个笃信东正教的国家。从公元 988 年罗斯受洗、东正教在俄罗斯发展传播之日起，它就在这片辽阔的大地上落地生根，并融入到了俄罗斯民族、国家、文化和民族思想的深处，纵观历史，在俄罗斯国家的兴起和发展演变过程中，东正教均发挥了其巨大而独特作用。尽管并非是政教合一的国家，俄罗斯国家政权与东正教联系沟通的密切程度在全世界仍然令人瞩目。在俄罗斯推行本国外交政策、维护与扩展国家利益方面，东正教都发挥了重要的辅助作用，是国家政权的重要盟友和影响俄国外交的重要因素。随着 1991 年苏联的解体、冷战格局瓦解后全球性的宗教复魅，俄罗斯政府扶持东正教重新登堂入室，通过倾斜性的立法和政策扩大东正教在俄罗斯政治生活中的影响力，俄罗斯外交政策受东正教影响的痕迹也愈加明显。无论是叶利钦梅德韦杰夫还是执政时间超过 20 年的现任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历届俄罗斯领导人都有亲近并利用其独特地位助力政府推行国家利益的倾向，这既是历史上俄罗斯政教特别是沙皇政府与东正教之间特殊且持久的合作关系在现代俄罗斯的延续和发展，也是俄罗斯政府在处理现实问题时不可避免的现实选择。

中国和俄罗斯互为对方最大邻国，两国关系的发展经历了几百年的风风雨雨，现在正处于历史最高点，成为了新型国际关系的典范。如何看待俄罗斯、如何处理中俄关系，是中国国际战略和国际关系的重大主题。从中苏关系到中俄关系，中俄两国历经考验，有过同盟，也有过对抗。深入研究把握俄罗斯外交政策及其背后的影响因素，对于我国外交政策的制定实施、构建更加稳定和建设性的中俄关系都大有裨益。

尽管俄罗斯问题研究一直以来都是国内区域国别研究的一个主要方向，俄罗斯外交也是俄罗斯问题研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但就目前俄罗斯研究的现状来说，从事俄罗斯外交根源研究者少，以东正教为切入点分析宗教因素之于俄罗斯外交政策影响者更少。出于政治目的而利用宗教作为推行政策的工具者并不罕见，而俄罗斯的案例值得特别的关注，原因有三：首先，俄罗斯拥有利用宗教提升海外形象的悠久传统；其二，俄罗斯外交具有深厚的发展潜力，非常值得研究；其三，东正教有海外的可供研究的教会分支，这是俄罗斯开展宗教外交的重要资源，说明了俄罗斯东正教跨国潜力之巨大。因此，本文将以俄罗斯外交政策中的东正教因素为研究对象，分析东正教何以影响俄罗斯人精神文化以及如何体现在俄罗斯外交政策的制定过程，并得出自己的结论。

目前我国学者对俄罗斯对外政策的研究，多是从地缘政治、政治经济利益、领导人因素等视角出发，很少挖掘其背后深厚的文化内涵特别是作为俄罗斯国教的东正教因素，这一方面是因为宗教学研究在我国起步迟、基础薄弱，另一方面是对东正教的研究长期以来偏向于文学和政教关系方面，且多以俄罗斯学者的研究成果为蓝本和研究方向，少有研究其与俄罗

斯对外政策之间的关系；从另一个方面来说，这也代表从事这方面的研究拥有广阔的空间，对两者作用关系的研究将会对深入把握俄罗斯外交的原则和行动方针、指导我国外交政策制定产生重要意义。

从理论角度来看，东正教代表着俄罗斯的历史文化，因此对俄罗斯独立后东正教复兴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这种研究视角不仅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俄罗斯问题，还有利于我们深入了解现代俄罗斯东正教的概况和俄罗斯的外交政策。透过这个角度，我们可以更好地认识到东正教发展与俄罗斯政府决策之间的联系，并找出宗教政策与国家政策之间的一些规律和原因。在这种基础上，我们还可以推测出可能形成的某些结果。其次，基于以上研究，我们可以指导国家在现代化建设中提高软实力、处理文化建设政策需要加以防范的相关问题。同时，研究俄罗斯政教关系可以为我们处理本国宗教问题提供历史借鉴，从而有效地指导我们在这个领域开展相关工作。综上所述，对俄罗斯东正教复兴的研究、探讨及分析，对于我们了解世界、增强国家软实力和处理宗教问题等方面都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现实意义方面，当代俄罗斯政治中的宗教并非无源之水、无根之木，而是深深植根于几个世纪以来的俄罗斯政治传统。更为重要的是，东正教触及俄罗斯制定对外政策的内在核心：身份认同、安全诉求、对于稳定和发展的追求。了解其在俄罗斯国内事务，尤其是外交事务中的作用，将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俄罗斯外交背后的动机和合理性——这有时极难解读。中俄关系的空前密切、俄罗斯对外的日益强硬和我国“一带一路”合作倡议的推行，都使得我国不可能置身事外，特别是俄罗斯参与中东事务和叙利亚危机、对乌克兰发起的军事行动、同美日印等大国和欧盟北约的关系对我国也具有重大利害，对俄罗斯外交特别是其精神内核的研究将有助于我国加强对俄战略预判，争取外交主动；以俄罗斯为案例对宗教文化与国家政策之间的研究也有利于我国检讨自身文化政策，从而为提高自身软实力、加强对外影响力提供借鉴；同时也有利于了解俄罗斯人民的信仰，有利于加强同俄罗斯等有着东正教信仰的国家和地区人民的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

二、国内外研究文献综述

（一）国内研究综述

东正教研究在我国是一个新兴的学术领域。我国学术界自上世纪 80 年代开始了对这一领域的研究，自那时起、特别是在 21 世纪之后，中国的学者们撰写了大量论著，讨论前苏联及俄联邦时期东正教与俄政权关系，以及东正教在俄罗斯国内政治和社会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这些成果对于我们了解俄罗斯的政教联动体系、进而研究东正教之于俄罗斯外交的具体影响起到了不可或缺的辅助作用。在这方面作出了深入研究的首推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戴桂菊，她以历史、文化和社会学领域为研究重点撰写了一系列著作，其中包括《俄国东正教会改革》、《斯拉夫：东正教的风貌》，以及论文《俄罗斯东正教会的外交职能》《从俄罗斯世俗学校恢复宗教课的过程看东正教会的作用》《国家与教堂的再度融合》、《俄罗斯东正教探源——罗斯接受基督教的原因与后果》、《俄罗斯东正教境内外教会恢复统一的意义》、《从

俄罗斯世俗学校恢复宗教课的过程看东正教会的作用》、《东正教与俄罗斯改革》、《俄罗斯东正教礼仪漫谈》等等¹。张雅平撰写了《东正教与俄罗斯社会》一书，在书中她回顾和总结了东正教在俄罗斯历史上的发展变迁，以文化战略的视角切入，对历史上不同时期东正教之于俄罗斯政治文化的影响路径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考察、梳理和评述。

要考察历史上俄罗斯东正教与外交活动之间的关系，不仅要考察作为宗教的东正教的本身，对教会的分析与研究也同样不可或缺。在这方面同样有一些中国学者做出了相当的成果。杨翠红在《俄罗斯东正教会与国家政权关系研究（9—18世纪末）》一书的部分章节中考察了9—18世纪俄罗斯外交活动中东正教会的参与情况，以及其在沙俄对外扩张中扮演的作用。乐峰所著《东正教史》一书具体描述了19世纪东正教会开展的与外交有关的活动，其中包括强迫新占领地区（南高加索、西伯利亚、中亚地区等）原住民改信东正教、两次卫国战争时领导国内东正教教徒为苏维埃政府抗击纳粹侵略者提供人力的支持、冷战后东正教会与西方教会的接触与和解等。刘玉英和苗贞、丁晓正研究了历史上东正教与国家政权互动演变的历史脉络：一方面，作为重要的意识形态资源之一，东正教可以为政治权力的合法性、权威性起到重要的支持作用；另一方面，俄罗斯历届政权从自身的统治利益出发，对于东正教采取了保护、支持和打击等不同政策；国春雷集中研究了东正教对基辅罗斯外交的影响，并将其归因为三个方面：一是基辅外交常陷于被动的重要原因是罗斯人固守作为东正教教徒的身份，由于与周边地区信仰的差异难以弥合而导致他们难以融入，俄罗斯历史上与周边地区的许多冲突即由此而来；二是在俄罗斯人数百年的对外扩张过程中东正教常常与之形影相随；三是古代时期罗斯教会的分裂，为当时的外交带来了更多的不确定性。作者因此指出，东正教思想是俄罗斯民族的政治文化指向和重要认同标准：对内自我确认、对外树立形象。郭小丽分析了弥赛亚意识之于当代俄罗斯的影响：在宗教层面，俄罗斯人认为只有自己才能拯救行将毁灭的世界；在精神层面，表现为俄罗斯人固守的欧亚主义；在政治层面，表现为想要成为强大国家。俄式弥赛亚意识既使俄罗斯民族始终具有全球化倾向；然而俄罗斯人有借此一再强调自己的独特性，进而有意识地与全球化浪潮保持一定的距离。

除此之外，中国学者还撰写了一些有关俄罗斯东正教与外交关系的专题性文章。柳思思在《外交的文化阐释·俄罗斯》一书中详细分析了文化对国家外交的影响途径，特别对“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的概念进行了辨析，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东正教在俄罗斯的复兴过程和原因、表现和影响。赖文斌、温湘频在《转型时期俄罗斯的东正教》一文中，通过举例俄东正教反对北约东扩、谴责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国家武力干涉南联盟及科索沃问题、在各种国际会议上配合政府谴责外国针对斯拉夫人的歧视等，论证了俄东正教会积极配合国家外交政策的具体措施²。沈影在《试析东正教在俄罗斯外交中扮演的角色》一文中指出，东正教会参与外交政策制定的根本目的其一是支持政府决策；其二是紧密配合俄外交部对前苏联加盟共和国境内俄罗斯人的保护；其三是加强对境内外东正教世界的影响，通过强化干预力促内外教会

¹ 苗嵩：《俄东正教教会与当代俄罗斯外交》研究现状述评》，载《国际研究参考》，2014年第10期，第43-51页。

² 赖文斌、温湘频：《转型时期俄罗斯的东正教》，载《西伯利亚研究》，2006年第2期，第66-69页。

的合并，实践普京总统“吸收一切促进俄罗斯振兴的力量”的理念¹。林精华在其《无所不在的身影：俄罗斯政治社会生活中东正教的作用试析》一文中指出，俄罗斯东正教将是俄罗斯联邦对外交的干预的另一股力量。他认为，从历史上看，自1054年东西方教会正式分离后，东正教就长期与天主教会相抗衡。时至今日，由于具有严重排他性，俄东正教也难以与新教和天主教教会发展关系²。

特别值得提及的是，上海外国语大学的刘中民教授曾对宗教与外交的关系进行了高屋建瓴的研究和分析³。他从国际关系理论变革的角度出发，对研究宗教和外交政策联系的既有成果进行了汇集和评述，进而从理念、决策和运行机制三方面剖析了宗教对一国外交政策的制定的影响。他认为：现行的国际体系在建立之初就是为了避免16-17世纪绵延日久的宗教战争重演，因此其“必须由国家主导外交事务”的世俗化观念导致了宗教因素长期在对外关系中被边缘化和隐形，然而宗教的因素事实上一直没有从民族国家的外交舞台上消失，反而是一直扮演着独特而不能忽视的作用。20世纪后期以来全球性的宗教复魅现象既导致了宗教对于外交政策的影响力不断上升，也成为了国际关系理论学界对这一陌生领域加强关注和研究的契机。

（二）国外研究综述

外国学者关注的是实行东正教的特定国家和地区，而研究俄罗斯东正教的学者则关注俄罗斯本身和前苏联东部。东正教在现代俄罗斯的复兴是俄罗斯学者研究的新兴领域之一，这些学者对于该领域的研究重点放在了东正教对包括政治生活和社会文化领域在内的作用当中。另一方面，该领域的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尽管东正教会与当代俄罗斯外交政策之间的联系已经得到了充分的研究，包括数量和质量上的研究。历史学博士、圣彼得堡国立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世界政治系主任亚齐亚教授说，俄罗斯知名政治评论家尼古拉-米特罗欣在为俄罗斯年轻学者热列茨卡娅的书《俄罗斯东正教会与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互动》所做的前言中推荐道：“我们向读者推荐的这本书填补了俄罗斯东正教会与国家在国际社会的空白。对宗教因素在国家外交政策中的作用的科学和实践上的差距：……目前还没有这方面的专业研究，即使是关于俄罗斯东正教的非常知名的作品也还没有涉及俄罗斯教会和国家在外交政策中的互动”。

泽比茨卡娅是第一个研究“俄罗斯东正教与当代俄罗斯外交政策”的人，并撰写了关于俄罗斯东正教会与国家在国际社会中互动的专著。在外交领域，他指出，俄罗斯东正教会和国家有共同的利益，因此它们之间存在着合作的基础。俄罗斯东正教会在配合国家政权的同时也保持了自己的自主性，体现为其在各种国际活动中既注重国家利益，也在拓展自己的利益。针对俄罗斯东正教会从属于国家，是俄罗斯外交政策的工具的观点。泽比茨卡娅认为，

¹ 沈影：《试析东正教在俄罗斯外交中扮演的角色》，载《西伯利亚研究》，2009年第1期，第17-19页。

² 林精华：《无处不在的身影——东正教介入俄罗斯社会政治生活试析》，载《俄罗斯研究》，2010年第5期，第108-127页。

³ 刘中民：《国际关系理论变革视野下的宗教与外交》，载《国际观察》，2017年第4期，第72-86页。

国家对东正教的作用（政教分离，宗教不参与政治）与东正教合作的现实不相符。此外，克拉诺维奇对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传统宗教”组织，包括东正教、伊斯兰教、佛教和犹太教参与俄罗斯“宗教外交”的情况进行了概述和描述。

波兰学者艾丽西亚·库拉诺维奇(Alicja Kuranowicz)在研究当代俄罗斯外交时提出了“宗教外交”的概念，指代国家在外交政策中使用宗教力量的措施，包括政府与宗教组织合作促进国家实际利益的一系列机制。它包括政府与宗教组织的一系列合作机制，以促进国家的实际利益。库拉诺维奇建议利用宗教组织的国际活动、宗教思想、俄罗斯东正教会的国际活动的主要作用和重要性以及俄罗斯联邦的许多外交成就归功于东正教会和宗教象征（为实现某些政治目标，对其进行相应的解释）等因素。

俄罗斯学者尤里·里阿贝奇(Yuri Ryabech)对俄罗斯东正教会在90年代的外交政策进行了总结和描述。他指出，俄罗斯东正教会在其国际活动中采取了爱国主义的立场对于俄罗斯与其他国家包括盟友之间的外交分歧，更多采取的是利用机制进行谈判解决的行动，加强“俄罗斯人、白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之间的团结”，并将其作为外交政策的重点。作者还指出，在苏联解体后的最初十年里，东正教会为俄罗斯国家外交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并且作为一种独特的社会力量助力国家外交政策的合法化。尽管宪法规定政教分离，但在实践中，俄罗斯东正教会与一些国家机构签署了合作协议，因此，建立它们之间合作的法律基础非常重要。

此外，叶夫多基莫夫的《俄罗斯思想中的基督》、以赛亚-柏林的《俄罗斯思想家》和汤普森的《理解俄罗斯》等作品对俄罗斯民族的心理特征、俄罗斯民族的特点和俄罗斯社会的历史，特别是俄罗斯民族独特的“二分法”进行了深刻的诠释，并指出俄罗斯民族的这种“二分法”是理解东正教对俄罗斯政治影响的一个重要突破口。

在俄罗斯之外，其他国家的学者们持有不同的观点和看法。例如，他们认为，俄罗斯的战略意图是在全世界的东正教民族中统一信仰，从而扩大俄罗斯的领土。这一观点的倡导者包括布热津斯基、德米特里-利哈乔夫等人。乌克兰国立大学基辅-莫赫拉研究所在2012年发表了六篇题为《宗教是俄罗斯对邻国外交政策的工具》的文章，指出乌克兰的俄罗斯东正教会利用其管辖的乌克兰东正教会作为支持该国亲俄势力和干涉乌克兰内政的工具。

一些学者，最引人注目的是历史学家詹姆斯-比林顿，研究了东正教会在俄罗斯联邦的影响和作用他在代表作《圣像与斧头》中更多地考察了俄罗斯精神文化内核背后的本土元素。约翰逊研究了身份在俄罗斯东正教会中的作用。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总结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术界一直围绕“俄罗斯东正教与现代俄罗斯外交”这一话题展开讨论。学者认为，俄罗斯东正教会配合俄罗斯政府开展外交活动，通过教会的理念、宗教标志和国际行动影响外国非政府组织和公众。它旨在影响公众态度，并告知和解释俄罗斯的政策。正统维度是俄罗斯外交的一贯传统。现代俄罗斯外交实践正是对这一传统的延续，这将帮助俄罗斯进一步巩固和加强在大部分前苏联加盟共和国区域内的影响力，同时有助于扩大俄罗斯在日渐多极化的世界中的发言权和召唤力。

总的来说，现有的研究都不同程度地包括了俄罗斯政治文化与其外交政策之间的关系。但大多对俄罗斯国家和国家的特点和命运进行多方面的分析和阐释，或从历史的角度回顾和总结俄罗斯的意识形态传统，但对实际政治中的具体外交政策进行分析。对东正教精神的研究仍然甚少，俄罗斯、前苏联国家和西方学者对外交领域国教合作的性质和有效性存在分歧。本文正是针对这种情况，通过研究俄罗斯外交政策的历史，试图系统地梳理东正教影响俄罗斯外交政策的脉络和规律。

三、研究方法

（一）历史研究法

运用历史资料，按照历史发展的顺序解读东正教与俄罗斯历代政权之间的关系和具体影响路径，有利于加深理解东正教与俄罗斯对外政策在历史演进中的内在逻辑，更清晰把握冷战后东正教与俄罗斯外交政策之间的微妙关系。

（二）归纳法

归纳法也叫归纳推理，它是指在分析研究某类事物时，通过该事物的某些对象所具有的性质，推断出该事物的所有该对象都具有该类性质。本文将从现有的文献资料中，将东正教发展的来龙去脉，俄罗斯从中世纪到苏维埃时期再到今天的宗教政策各项细节加以整理与归纳，并从东正教推广开来，分析宗教对国家政府对国家领导人制定对外政策的重要作用。

四、研究思路及论文结构

本论文分为八部分，包括绪论和七个章节。在绪论部分，阐述本课题的研究背景和研究价值所在，回顾国内外学者对于东正教和俄罗斯政教关系的已有研究成果，并分析论证课题所基于的研究方法，简述本论文的预期创新点和存在不足等。

第一章对宗教外交的理论展开分析，内容包括宗教与公共外交的理念，以及宗教因素是如何作用于国际关系领域的。宗教在拓展国家的影响力、增强国家的软实力等方面都有着自己独特的作用，并且可以在外交政策中扮演“路线图”和“粘合剂”的角色。

第二章研究东正教在俄罗斯的地位和影响。首先探究东正教的产生历程及其特点，它源自于罗马帝国灭亡所带来的基督教东西大分野，具有依附皇权、强调自身纯洁性等特点；接下来分析东正教在俄罗斯历史中的变迁以及在不同时期与俄罗斯外交之间的关系，分为基辅罗斯时期、沙俄时期和苏联时期三大部分来叙写。通过对历史的研究我们会发现，无论时代怎样变迁，东正教都紧密地与俄罗斯世俗权力紧密地绑定在一起它为王公贵族和沙皇统治合法性提供宗教背书，将信徒团结在国家的旗帜下，也是国家在外交场上不可缺少的外交工具，是俄罗斯对外行动的精神依托。最后分析东正教对民族精神的影响及其在外交领域的体现。经过千年的发展东正教已经深深嵌入了俄罗斯民族精神的核心，包括救世主义的使命感、权力崇拜的民族心理、二律背反的性格特征、忍耐受苦与尚武重战的习性，这些既是民族性格，

也是俄罗斯对外政策的风格。

第三章探讨当代俄罗斯政治家叶利钦和普京外交背后的东正教因素。叶利钦时代的对西方亲近与东正教历来的“使命意识”并不相悖，相反的是宗教还成为了俄欧之间拉近关系的粘合剂；然而其试图转型的民族国家身份与东正教信仰基础上的帝国性存在根本性的，也决定了俄罗斯的“向西看”外交政策不可能成功；普京作为东正教信徒和优秀的政治家十分重视利用东正教的心灵力量服务于自己的大国战略，将它作为一个特殊而有力的工具促进国内的团结并面对同西方的斗争。

第四章分析东正教影响下俄罗斯外交政策的具体表现。首先是在后苏联地区保持意识形态主导，对于乌克兰、白俄罗斯、南高加索和摩尔多瓦等地区，即使不取得控制权，至少也应整合上述地区的精神空间，建立和保持俄罗斯对他们的意识形态主导，而东正教正是俄罗斯可以利用的意识形态。其次是积极开展软实力外交，扩展在东正教世界影响，力图在全世界范围内保持俄罗斯的文化影响力和感召力，利用宗教作用来缓和同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关系，这也与普京上台后主推的国家“主权民主”战略相呼应。其三是俄罗斯东正教会的积极参与，即强调俄罗斯的独一无二的欧亚文明属性，在多极化的世界中谋取有利的大国地位，而作为政策制定者的俄罗斯当局显然也乐见东正教会作为自己在精神文化领域的战友发挥其自身独特的作用。

第五章对东正教影响俄罗斯外交的根源进行分析。一方面是东正教自身发展的需要，尽管在现代俄罗斯东正教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空间和成就，但是它显然不想仅仅停留于此，而是希望进一步扩充自己的势力，并在政治生活里获得更多的话语权。另一方面是现实政治的需要东正教是俄罗斯实施大国外交战略的精神支柱、对外政策争取民意的关键、巩固意识形态防线的中流砥柱，团结在东正教旗帜下的俄罗斯人所迸发的强烈爱国主义情结，正日益成为俄罗斯巩固自身意识形态防线、抵御西方攻击与侵蚀的中流砥柱，受此影响下的对外政策也越来越明确维护自身大国地位和利益的目标，并采用日趋强硬的手段来维护这一目标。

第六章以俄罗斯在乌克兰危机中的政策和行动为案例作具体研究。乌克兰危机的爆发具有其宗教背景，既有东正教弥赛亚意识与民族自我意识的身份认同之争，也与莫斯科牧首区与基辅教会的分裂带来的东正教世界动荡不无关系。在弥撒亚意识的指引下，俄罗斯坚信乌克兰和自己本是一家，乌克兰的西化显然构成了对俄罗斯帝国底蕴的挑战，在救世观念的指引下俄罗斯毅然介入到乌克兰危机当中；东正教特有的苦难意识和集权思想减弱了普京面临的国内压力，使他能更加坚定地领导俄罗斯人民面对西方的“极限制裁”。

第七章是结论。东正教强大的精神力量和厚重的文化寄托是这个国家历经磨难却保持住了自身特色的关键；在俄罗斯外交活动中，作为精神内核和意识形态主导的东正教始终作为一只“看不见的手”发挥着独到而无处不在的作用。对于俄罗斯而言，东正教并不仅仅是一种宗教，它还是俄罗斯民族意识的内在构成，是推动俄罗斯社会进程的精神动力与精神资源。在研究俄罗斯外交政策的背景、特点和缘由时，我们应该更加重视它背后的精神文化因素

五、创新点与难点

本文的创新点有以下几点：

（一）对东正教因素之于俄罗斯外交政策的影响、以及国际关系中的宗教因素这一前人较少涉足的领域进行较为系统的研究总结，并尝试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二）较为细致地剖析了东正教的精神内核如何对俄罗斯民族的精神文化加以影响，以及如何具体地在俄罗斯外交政策的制定和外交目的实施过程中施加其影响；

（三）以非传统外交理念和宗教外交理论为理论抓手，提出俄罗斯大力扶持东正教并扩大其在对外交往中的影响力既是出自于宗教力量驱动，更有其现实意义和考量。

本文的难点有以下几点：

（一）研究对象敏感。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尽管近年来对宗教的社会认识和文化认同的研究已取得很大进展，但宗教及其相关研究在中国学界一直被认为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领域，不能讨论更不能从积极、正面的角度来评价宗教。尽管本文研究对象是俄罗斯，如何适当地定位宗教因素及其影响仍是本文写作过程中常常需要考量的首要因素；

（二）研究资料少。有如前文所述，对宗教与外交关系进行考察目前尚属于一个冷门领域，相关研究资料特别是中文研究资料缺乏；外文研究资料中，俄罗斯学者的研究资料充斥着该国国际关系学研究常有的大国沙文主义和扩张主义倾向，而欧美特别是东欧学者的研究则是以对俄罗斯的敌视、批判与否定为研究基调，在研究借鉴过程中常常需要加以甄别和筛选；

（三）探究东正教之于俄罗斯外交的影响时，实际上是分别探究“作为社会特殊意识形态的东正教”和“作为东正教存在与传播的基本组织的东正教会”的影响。其中，对东正教会进行研究可以从其领导人的谈话、采取的行动、签订的文件等具体的研究材料着手；然而对于东正教本身的影响方面，由于精神力量发挥的作用是看起来虚无缥缈的，因为只能先总结出这种宗教本身会赋予其信徒和被影响者的特质，然后假定外交政策中的哪一方面或者哪一条是切合这一特质的。如果政策制定者明确表示自己这样做是收到了东正教的影响则最好，但这种情况毕竟是少数，多数情况下只能进行推理和假定而无法证实。如何在“虚”与“实”之间搭起桥梁并证明二者之间确实存在因果关系是本文写作中时时刻刻面临的挑战。

（四）受限于时间与笔者个人研究水平与写作水平，在选题、写作计划、资料收集和言语表达方面欠缺学术研究的经验和专业性，尽管得到了导师和师长的大力帮助与自己的认真检查，在本文的写作过程中仍不免出现文章谋篇布局与表达等方面的问题。

第一章 宗教与外交：理念、内涵与具体影响

一、宗教与公共外交理念

什么是宗教？宗教是一种弥漫在人们意识中的精神力量，被认为对包括外交在内的国家制度和政治产生重大影响。梁漱溟先生曾说：“人类文化都是以宗教为端，且每依宗教为中心，人群秩序及整治导源于宗教，人的思想知识以致各种学术，亦无不导源于宗教¹。”流行已久并依旧在国际舞台上盛行的公共外交，其最初的起源随着威斯特伐利亚范式于 1648 年建立“主权秩序”，宗教长期被排除在外交舞台之外。近年来，特别是冷战结束以来，随着全球化的推进和身份政治的兴起，在全世界范围内宗教出现了复兴的现象，当今西方宗教界、学术界和政界已经达成共识，认为宗教需要回归外交领域，现代外交往往强调通过宗教进行务实外交。应该利用宗教的力量来促进世界的开放和多极化进程，在非传统外交领域建设和平、维护安全、打击恐怖主义、促进民主。

（一）公共外交的宗教背景

公共外交又被称为“人民外交”(people's diplomacy)，是指一国政府发起的旨在于国外民众直接对话和沟通的外交努力，其目的是争取外国公众对于本国对外政策和行动的理解与支持。公共外交最早的起源可追溯至 17 世纪，在西方开始向全球拓展势力范围的时期，经过宗教改革而适应了资本主义时代需求的基督教也随着资本逐渐传播到了世界各地。在赤裸裸的传教行为遭到警惕和抵抗后，教士们改而披上了“文化传播”的外衣，将努力的重点转向了文化教育事业。这并不意味着传教士们就此放弃了传教活动，恰恰相反，他们的目的依然是鼓动“异教徒”们皈依于基督教，是一种对非西方国家和地区人民的思想西化行动，以实现文化征服，服务于西方的经济和政治目的。这种为传教热情所驱使的对外交流活动成为了公共外交的滥觞。

公共外交的起源与宗教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其发展至今依然时时刻刻透漏出宗教的魅影，世界各国特别是宗教氛围浓厚的国家，更是注重利用宗教开展自己的公共外交攻势。举例来说，美国大力鼓吹宗教和平论，并与国家安全战略融合推进，大力扶持宗教组织以提升国家实力；梵蒂冈以宗教的公共性作为统合，不断努力推动天主教会成为普世道德权威，通过支持天主教会在全球社会中提高地位和影响力促进本国软实力的提升；以色列政府长期注意利用宗教和历史因素争取其他国人民特别是美国人民对自己的同情和帮助，宗教游说和宗教活动也是以色列争取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支持、进而提高本国在强敌环伺的恶劣地缘政治环境中的自卫能力的重要武器；欧盟国家、印度、日本等国也更加重视宗教因素的作用，

¹ 本书编辑组：《梁漱溟全集》第三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97-99 页。

将其作为自身整体外交中的重要一环¹。

（二）宗教外交的含义与特征

宗教与外交的关系越来越为学界所注意和讨论，而在诸多讨论和争议背后的，则是对宗教外交的定义尚且未能达成一致。作为一套机制组成，宗教外交指一国政府在国际事务处理中利用宗教的各个方面为己服务，包括宗教思想、宗教话语、宗教符号和宗教组织例如教会。大多数历史争论来自于对古代时期（主要是指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形成之前）宗教和政治生态关系的探讨，中世纪欧洲和拜占庭帝国之间宗教与政治之间的关系，以及立陶宛统治者如何被允许维持其立场并从宗教外交中获益。

美国学者戴蒙德和麦克唐纳较为重视宗教的地位和能力，并将宗教视为多渠道外交系统的第七部分。约翰斯顿提倡“忏悔外交”的概念，强调信仰是现实政治的延续，他认为，外交形式和外交资源并非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需要进行适时地更新，特别是在冷战后全球宗教复兴的背景下。他还详细描述了新外交的目的、外交官应具备的水平、如何建设和平、如何进行预防性干预。在中国学者中，徐义华提倡“宗教外交，即不同宗教传统的信徒进行的以促进宗教理解为主要内容的外交”。他对“基于信仰的外交”，包括核心价值提供了广义和狭义的解释。

宗教外交大致包括以下四个要素：首先，尽管教会在其中发挥着不容忽视的作用，宗教外交的实施主体应该确定为一国的政府部门或由其指定的机构和个人；第二，宗教外交的受众一定是普通的民众；第三，宗教外交的核心诉求是突破以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为核心的国际体系的限制，最后，宗教外交的目标是促进国家利益的拓展和宗教的对外传播，更好地服务于国家政权和外交政策。

（三）宗教外交的内涵与机制

宗教外交的内容和机制，按照实施的目标和方式，可以分为以下三类。

（一）政府实施和发起的宗教外交：指外交机构和外交人员直接代表国家开展的以宗教价值观为指导的外交活动。这种宗教外交将宗教纳入外交机制，外交部门设立专门机构处理对外宗教事务。这体现在比较明确的外交领导思想、具体的操作规范和工作机制上。前述俄罗斯政府扩大东正教在外交领域的影响，就属于这一类。

（二）宗教组织主导的宗教外交：指的是一个政府将外交任务委托给宗教组织或者宗教人员，有他们负责落实外交目标的过程。在俄罗斯，这意味着东正教会广泛支持公共外交，在国际事务中采取爱国而非民族主义立场，通过多边谈判解决俄罗斯与其他国家之间的争端和分歧。机制来解决它们。

（三）宗教游说外交：一国宗教组织经本国或他国政府同意而展开的游说活动，游说对象通常为外国政府和国际组织。在俄罗斯，尽管宪法规定政教分离，但东正教会与政府各部

¹ 涂怡超《宗教与当前中国公共外交:理念、机制与效应》，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15年第6期，第12-30页。

门签订合作协议，提出社会和政治理念，使国家外交政策合法化，正在日渐成为一支强大的力量。

二、国际关系中的宗教因素

（一）拓展国家影响力的“旗帜”

如前文所述，基于对国家利益的考量，当今世界各国、特别是宗教氛围较浓厚的国家在处理国际关系的过程中，对于宗教因素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尽管常被认为是一种虚无缥缈的精神力量，宗教却拥有着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所不及的精神上的广阔“版图”，即影响范围广阔、影响信众众多。如徐以骅教授在《信仰中国》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样，拥有丰富宗教资源的国家应借助宗教建立自己的“信仰版图”，以为本国的国家安全提供一道隐性的战略缓冲地带，为本国经济发展提供一片广阔的“地缘经济”区域，为本国树立良好的国家宗教形象提供支撑力量¹。这种巨大的影响力为一些政治领导人所利用，成为了拓展国家影响力的旗帜。

以美苏两国在冷战时期积极利用宗教因素辅助外交角力为例，双方均将宗教视为一种外交工具。如美国心理战略委员会的一封密级备忘录所指出的那样，“宗教作为一种同共产主义斗争的工具的潜力是极其惊人的……我们寻求利用宗教作为一种冷战武器的总体目标是促进世界宗教兴旺，因为共产主义在一个宗教兴盛的世界里是无法存在的。”杜鲁门政府在实施遏制战略时也借助宗教来确定遏制的范围，即相信上帝与道德准则的国家将会参与遏制，而不信仰上帝的国家将会被遏制²。美国借此拓展了自己在欧洲国家特别是二战后共产主义运动风起云涌的东南欧国家之间的精神影响力，宗教成为了美国全球战略拓展和扑灭欧洲大陆上革命火焰的重要因素。冷战结束后，美国将宗教自由民主和平论与国家安全战略相结合，宗教自由位列人权第一位序，以宗教自由为由头、以民主和人权为号召以维持美国的霸权地位，打压新兴国家发展；以色列长期注重在外交中运用宗教因素，以政府与领导人频繁会晤基督教锡安主义组织领导人并支持在以设立分机构，利用上述教派在西方的巨大影响力以争取有关国家和民众的同情与支持³；沙特阿拉伯以成为伊斯兰教之宗主国和全世界穆斯林的精神盟主为其优先战略目标，不仅设立了专门的朝觐部，还常年巨额资助各类国际伊斯兰组织，利用宗教的影响力来拓展国家的影响力。

（二）外交政策中的“路线图”和“粘合剂”

宗教可以成为制定外交政策的“路线图”。是一种根基极其深厚的道德观念体系，对于有宗教信仰的国家领导人而言，宗教理念是其世界观和价值观构筑的基石，其中的“正邪之分”“善恶之别”“敌我关系”等等也会直接影响到对国际关系和具体国与国事务的判断和具体政策制定。举例而言，美国在冷战期间常常将东西方两大阵营的对峙描绘成“自由世界与专制

¹ 徐以骅、邹磊：《信仰中国》，载《国际问题研究》，2012年第1期，第43-58页。

² 贾付强：《冷战时期的美苏宗教外交》，载《公共外交季刊》，2015年第1期，第36-42、124-125页。

³ 涂怡超：《宗教与当代外交：历史、理论与实践》，载《国际政治研究》，2017年第5期，第10-39页。

世界的殊死搏斗”，将自身遏制苏联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政策和行为描绘成一场“抵御邪恶的共产主义侵略”的“十字军东征”，其目的是唤起以基督教徒为主体的国内民众的宗教热情和危机意识，为自己的这些对外政策和行动增添合法性、扩大支持度；冷战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主要是信仰基督教的西欧发达国家）在中北美及加勒比海地区、巴尔干半岛和中东地区等地多次发动的“人道主义干预”、以“保护人权”为幌子对别国的肆意攻击与横加干涉，都与基督教的“正义战争论¹”不无关系。

宗教可以成为执行外交政策的“粘合剂”。对于那些政治和宗教关系密切的国家而言，充分地利用宗教的力量可以增强虔诚的教徒们对于国家政权的认同感，以增强国内社会的凝聚力；对外而言，可以方便拉近那些信仰相同或相近的国家关系以便于自身的外交政策实行，形成更强大的力量抵御那些不够友好的国家的攻略。这里以信仰伊斯兰教的伊朗举例，伊斯兰教的什叶派因素被伊朗利用来影响伊拉克的战后重建，作为什叶派占领导地位的伊朗积极尝试边缘化曾在伊拉克掌权的逊尼派，并积极利用伊斯兰因素应对席卷中东各国的“阿拉伯之春”，将西亚北非的动荡定性为“伊斯兰觉醒”和 1979 年伊朗伊斯兰革命的延续，这既是伊朗利用宗教因素抢占道义制高点、扩大自身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在中东地区影响力的体现，也反映了伊朗利用宗教因素抵抗美西方国家“和平演变”和所谓“民主改造”的现实考量²。

（三）增强国家软实力的可行手段

美国著名国际政治学者约瑟夫·奈以最早提出“软实力”概念而闻名于世，其所说的“软实力”，主要包括文化吸引力、政治价值观吸引力及塑造国际规则和决定政治议题的能力，其核心理论是：“软实力”的发挥作用依靠的是自身的吸引力，而不是强迫别人做不想做的事情。显而易见的是，作为人类历史上影响极其深远的精神力量，宗教具有超越意识形态和国家边界的特点，是国与国之间和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人民之间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³，是国家构筑软实力的一种十分有效的来源，常常有一些国家积极利用宗教来开展对外文化交流活动，为增强自身的文化软实力提供助力。

举例来说，美国政府从 1998 年起每年根据自家国会通过的《国际宗教自由法》评估各国的宗教自由状况，将“从制度上严重侵犯宗教自由或放任相关行为的国家”列为宗教自由“特别关注国”名单，列入该名单的国家需要改善宗教自由状况，否则将接受美国政府的制裁。这份法案固然有助于促进全世界宗教信仰自由，然而其初衷却是以前者为幌子，在全球贩卖自己的美式民主，《国际宗教自由法》为美国提供了道德的制高点和行动的合法性，是美国软实力的重要来源。

¹ 正义战争论（Just War Theory）是基督教实践神学命题，由奥古斯丁首先提出，认为基督徒并非全然不能参与战争，战争可以为着伸张正义与重建和平的缘故而进行；正义的战争必须由合法的统治者来发起和领导，并且基督徒战士必须以爱的态度对待敌人，不可假战争之名进行屠杀和掠夺。现代的法学家认为进行战争的各方一般都认为自己是正当的，正义战争论在国际实践中难以成为衡量战争是否为正义战争的标准，因此并没有实际意义。

² 刘中民：《后霍梅尼时代伊朗外交中的伊斯兰因素——从拉夫桑贾尼时期至内贾德时期》，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19 年第 4 期，第 3-18 页、第 118 页。

³ 《重视宗教在提升文化软实力中的独特作用》，载《中国宗教》，2013 年第 6 期，第 1 页。

第二章 东正教在俄罗斯的地位和影响

一、东正教的产生与特点

以基督教为国教的罗马帝国的分裂，为东正教的产生提供了契机。公元4世纪罗马帝国衰落的背景下，罗马皇帝将首都从罗马迁到小亚细亚半岛上的君士坦丁堡，于是基督教逐渐出现了罗马和君士坦丁堡两个独立行事的中心，二者对于教义解读和传教的问题也逐渐积累和激化。双方的争执到了9世纪愈演愈烈，以教宗利奥九世调停失败为标志，1054年东西方教会公开大分裂，东罗马教会自称为“正”，强调自身是信经所说的“从使徒传下来的，惟一的”教会，认为基督教最原本的传统和教导只在“正教会”得到了保留。由于与罗马教会相对，正教位于东方的方向，故此又称为“东正教”。东正教由此而正式形成。尽管东罗马帝国在1453年被信仰伊斯兰教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最终灭亡，然而其在俄国却保持了强势的地位，因此自称第三罗马的莫斯科取代了君士坦丁堡成了新的东正教会中心，俄罗斯也成为至今最大的东正教国家。

普世意义上，东正教一般被认为有以下几个特点：

1.教权依附于皇权：在西欧，宗教权力与政治权力长期处于对立关系，教权与王权经历了几个世纪之久的激烈争斗和博弈。而与之相反的是，在东罗马和随后的俄罗斯，教权始终臣服于皇权之下，并不对统治阶级造成实质性的威胁，同样的，东正教的信众们也没有将二者视为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实体，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关系，这种观念也有利于皇权加强对教权的控制。14世纪末君士坦丁堡宗主教安东尼曾致信俄罗斯大公瓦西里表示：“拥有一个教会而不拥有一个国王，对于基督教而言是不可能的……国王和教会处于一个伟大的共同体中，具有一种伟大的同一性，任何人都不可能将他们分割开来”。由于在东正教等级制度中占有独特而特殊的地位，被尊为特殊的圣人、“上帝选民”的代表、上帝在世界上的代表和教会的最高领袖，皇帝因此拥有巨大的权力。作为东正教会的最高领袖，沙皇有召集和解散宗教会议、任免大牧首甚至是对经文教义的解释权。在17世纪末彼得大帝改革后，神职人员转变为实质上的公职人员，他们在公立大学接受教育，并由国家支付工资。作为回报，他们有义务为国家的利益服务。神职人员必须宣誓效忠于沙皇，教会指定去实现特定的目标，例如对被征服领土的文化同化。正如马克思所说，“国家与教会、世俗生活与宗教生活混为一体，这正是东正教与其他基督教教派的区别所在。”

2.坚持教义的正统性：俄罗斯东正教认为自己全盘继承了希腊正教会的传统，其最重要的目标是保全自己。东正教相比于新教和天主教表现出更多的保守性，体现在它只承认最原本的圣经文本和圣传，反对新教和天主教徒对教义的“任意修改和胡乱解释”，这种对自身正统性的信念和强烈的保守主义倾向同样对俄罗斯人影响深远。

3.多中心：随着历史的发展，东正教在全世界各地繁衍生根，陆续成立了数个独立的小教

会，分布在俄罗斯、希腊、保加利亚、塞浦路斯、希腊等地，且各自均为独立的小教会。按照规定，这些独立自主教会在名义上尊重君士坦丁堡教区牧首的首席牧首和精神领袖地位，但它们互相之间是独立自主的，能以自己独到的特点领导本教区的信徒们从事宗教活动。

二、东正教在俄罗斯历史中的变迁

公元 988 年弗拉基米尔大公接受基督教的洗礼，被普遍视为东正教在俄罗斯落地生根的标志。原本流行于俄罗斯大地的多神教信仰慢慢被打击和取缔，许多万神殿改建为基督教教堂，俄罗斯人民接受基督教为国教。从此，东正教在俄罗斯的土地上日益成长。在一千多年的发展过程中，东正教与俄罗斯互相影响，互相制约。

东正教在俄罗斯大地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几个阶段：

（一）基辅罗斯时期

俄罗斯的历史一般可以追溯至创立于 9 世纪的基辅罗斯，是一个以现今乌克兰基辅为中心的、斯拉夫人为主体的东欧君主制国家。在建立之初，由于国家基础较为落后，因此统治阶层有求于宗教，需要利用宗教的力量巩固自己的统治。在拜占庭盛行的东正教因为迎合了罗斯君主的需要而受到欢迎，随后更被拥立为罗斯的国教，在历代罗斯君主的大力支持下，东正教会势力逐渐发展壮大。

基辅罗斯的接受一神教、特别是接受以东正教作为自己的国教，从历史的角度看都具有其必然性。在 10 世纪，基辅罗斯周边的一些比较兴旺的国家都已接受了一神教，包括基督教、伊斯兰教、犹太教等都是罗斯大公潜在的选择；经过贵族和长老们的仔细考察，对于在拜占庭帝国占主导地位的东正教兴趣渐增，这主要是出于以下几个原因：首先，与基督教只禁止使用除拉丁语之外的语言作为礼拜语言所不同的是，东正教虽然以伯罗奔尼撒语言为主要是用语言，但并不排斥各地方的民族语言，这对于当时尚身处半“蛮荒”地区、鲜有掌握拉丁语言的斯拉夫人而言，意味着他们接受东正教做礼拜的难度会更低；其次，由于地理相近并有黑海可供水路航行，拜占庭与东欧之间的贸易历史悠久、往来频繁，斯拉夫人将东欧各地出产的麦子、蜂蜜、动物毛皮和奴隶运送到君士坦丁堡，换回东方的各种盔甲、青铜制品和金银器。正是在长期的对拜占庭的贸易之中，统治罗斯的王公贵族以及他们的亲兵逐渐接触到了东正教，这些人的接受和皈依东正教，对于执政的罗斯大公有着重要的影响；最重要的是，在拜占庭基督教会治下的各大牧区都有相对的独立性，这意味着在接纳东正教后基辅罗斯新成立的教会所有权将归政府机构所有，而不必受到拜占庭总教会的掣肘；东正教会宣扬“君权神授”的思想，一国之君作为国家的首脑是神在人间的代表，君权高于教权，教权为君权所掌握；拜占庭皇帝不但有解释教义、制定教规、主持宗教生活的权力，还可以直接任免教会牧首、召集宗教会议。由此可以认为，东正教对于君权的示好、对国家机器的归顺，适应了新成立的基辅罗斯加强王权、打造统一封建国家的迫切需要，是其最终接纳东正教的根本原因。

以上一系列因素，最终促成了公元 988 年的罗斯受洗。这一年，统治罗斯的弗拉基米尔

大公与拜占庭帝国政治联姻并结为同盟，他宣布皈依东正教，并要求自己的臣民破除之前的多神教信仰，统一到第聂伯河岸边接受东正教神职人员的洗礼；此后，弗拉基米尔大公确立东正教为国教，并向全国各地推广之。

在 988 年基辅受洗之后，俄罗斯成为了一个单一宗教（东正教）国家。对于新兴的这个封建国家而言无疑具有很重要的进步意义，在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诸多维度上，都促进了国家的发展和完善。对统治地位的巩固、封建地主经济的强化、国家法制的完善自不必多说，我们重点分析东正教对于基辅罗斯外交方面的建树：第一是促进了俄罗斯与周边国家睦邻关系的发展。由于文化和经济基础的落后，新兴的基辅罗斯国际地位实际上是很低下的，而在接受了源于基督教的东正教作为国教以后，周边国家如捷克、保加利亚、塞尔维亚等与罗斯打交道的意愿都加强了。如根据罗斯编年史记载，在受洗 4 年以后，捷克王公于 992 年派遣使臣前往基辅，向弗拉基米尔大公“表示敬佩和敦睦之忱，祝贺大公受洗，并赠以厚礼¹。”基督教在罗斯的流行也促进了罗斯王室与外国的联姻，如弗拉基米尔大公在受洗后便迎娶了拜占庭皇帝的妹妹安娜公主，各地的王公也应纷纷迎娶来自拜占庭、波兰、瑞典、英国的公主，或是把自己的女儿远嫁到各国的统治者那里为妻，在史籍记载中共有 65 处之多²。在古代的欧洲，联姻是一个很重要的促进双边关系的方式；第二，东正教帮助罗斯在国际事务中趋利避害：11 世纪末罗马天主教教皇发动了著名的“十字军东征”，即以收复穆斯林手中的失地为名进攻地中海东岸国家，是一场旷日持久、规模庞大的宗教性军事行动。东正教信仰为罗斯人提供了一个极好的参与由头：尽管并没有直接出兵支持罗马教皇，罗斯却对武装夺取穆斯林政权手中的土地很感兴趣，同多神教和游牧民族展开残酷斗争可以以东正教作为自身的正当理由；13 世纪罗斯面临着骑士团的威胁，罗斯领袖亚历山大·涅夫斯基以他的虔诚祈祷鼓舞了军队作战的信心，他率领罗斯军队击退了瑞典人的侵略，遏制住了日耳曼骑士团的前进步伐，他因此被东正教会封为圣徒（其名字“亚历山大”在俄语中本意即为“保卫者”）。

（二）沙皇俄国时期

随着历史的发展，在经历了蒙古西征以及随之而来的“鞑靼桎梏”、莫斯科公国时期后，到 18 世纪彼得大帝大刀阔斧的改革促进了俄罗斯走上了西化之路，也由古代进入了近代。彼得大帝将东正教会视为自己西化改革之路上最大的阻碍，因为教会为了保护俄罗斯人的纯洁信仰不被玷污而反对外国人在俄罗斯定居和建造其他宗教的教堂，对于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也十分冷漠，甚至阻碍俄罗斯对外的文化交流，这显然是为彼得大帝所不能容忍的，他对宗教领域也展开了大刀阔斧的改革。首先是削减教会庞大的地产，连续颁布了几道命令促进教会财产的世俗化，这样他就把教会的金库变成了自己的财富之源；彼得大帝有感于东正教会牧首强大的实力与号召力，下决心废除了原有的牧首制，改为建立教会委员会，使得教会从此完全隶属于国家，变成了国家政府下属的一个宗教管理机构，尽管东正教依然是俄国的国教，但教会与国家之间的权力之争已经完全不复存在了。

¹ 杨翠红：《俄罗斯东正教会与国家政权关系研究》，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53 页。

² 同上，第 54 页。

在彼得大帝改革直到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这 200 年间，教会完全成为了沙皇政府的附庸。“教会将来和现在都不能留下自主和独立的事务——因为国家把一切事物都算做是自己的事物。政权给教会留下的东西少的不能再少了，因为国家感觉和认为自己是绝对的主宰¹。”随着专制制度的加强，教会在国家的地位不断降低，为了保护自身的利益，教会极力地阿谀奉承沙皇，奉行自己神化皇权的职责。彼得大帝去世后，无论是继位的伊丽莎白还是后来的保罗一世、叶卡捷琳娜二世，教会都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如莫斯科神学院院长彼得罗夫称彼得三世为“上帝安排就任全罗斯的帝位的圣人”“仁慈、宽容、公正、勇敢”；给女皇叶卡捷琳娜安上了“英明伟大的皇帝和国母”的高帽子²，通过这些赞扬和崇拜证明自己的皇权的忠诚。

在外交方面，东正教完全成为了俄罗斯帝国对外扩张的工具，它是沙皇政府对外发动战争的幌子。在 18 世纪末，由于日以加强的专制统治和残酷的剥削引起国内社会经济矛盾的不断激化，沙皇政府越来越急于把侵略战争作为转移国内矛盾和巩固自身统治的手段。与此同时伴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不断发展，俄国国内的市场已经不能满足贵族和商人的需求，他们迫切要求打通黑海出海口以开拓新的市场，控制着西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地区的波兰就进入了俄国侵略军的视线。尽管政治和经济原因是俄国向波兰开战的主要原因，宗教却成为了借口：叶卡捷琳娜女皇充分利用了波兰不同信仰之间、特别是天主教徒和东正教徒之间的摩擦和矛盾，挑动宗教与民族纷争，终于在 1767 年以“支持民族原则，保护在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东正教徒和在德国的新教徒”的名义，发动了侵略波兰的战争，随后又以同样的理由，伙同德国和奥地利三次瓜分波兰，导致了曾强盛一时的波兰国家的最终灭亡，波兰人民陷入了悲惨的百年奴役中。在对外征服的大军后接踵而至的是东正教的传教士们，他们以“救世主”自居，强硬地逼迫高加索和西伯利亚被征服地区的人民改信东正教，禁止原有宗教如伊斯兰教和萨满教的传教和宗教活动。以高尚纯洁的上帝在人间代表自居的东正教成为了非正义的侵略战争的旗号，成了沙皇政府推行俄罗斯化、镇压人民反抗的打手和帮凶，这直接证明了东正教之于俄罗斯政府的附庸地位。

（三）苏联时期

十月革命使得俄罗斯大地上诞生了一个崭新的国家，诞生了全新的苏维埃政权。对于宗教的态度，苏维埃政权在其第一部宗教法令中明确提出“教会与国家分离”，不但剥夺了东正教的国教地位，还收回教会的土地，强制教会与学校脱离，从而大幅削弱了东正教会对于世俗生活的影响。此外，列宁还针对部分地区东正教会煽动信徒从事反苏维埃的活动进行了严厉的打击，但并没有完全禁止东正教会的活动。然而到了 20 世纪 30 年代大清洗时期，宗教领域包括东正教也不可避免的受到了波及，这一时期全国范围内的东正教堂均被强制关闭，反对这一政策的人也遭到了不同程度的迫害。

¹ 格奥尔基·弗罗洛夫斯基著，吴安迪，徐凤林，隋淑芬译：《俄罗斯宗教哲学之路》，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06 年版，第 121 页。

²

在二战时期（俄罗斯称为第二次卫国战争时期）东正教会积极捐献金钱和物资支援抗击纳粹前线、号召信徒为国家出力抵抗侵略，这为东正教自己争取到了发展的空间并促进苏维埃政府于1943年成立了民族事务委员会，并选出了此前长期空缺的牧首。苏联政府也开始利用俄罗斯的宗教外交传统，在1946年支持莫斯科宗主教区成立了对外事务部，这个部门为东正教外交的发展和专业化做出了贡献。苏联对东正教会的支持主要有两个目的：首先是作为装点门面的吉祥物，即东正教的存活与发展本身可以证明苏联是一个尊重信仰自由的国家，这对于铁幕另一侧的西方国家的言语攻讦是一个事实上的有力回击；其次，东正教可以作为一个独特的非正式外交渠道，帮助苏联政府处理与其他东正教国家的关系，主要是与北约成员国希腊和同属华约的中东欧国家之间的关系。俄罗斯东正教会在国际宗教界（包括世界基督教协进会）的活动对苏联拓展外交渠道、改善自身的外交处境也至关重要。

然而好景不长，到了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尽管国家在经济上为东正教会提供了更多帮助，针对教团活动的监视和控制也不断加强，赫鲁晓夫甚至把对东正教徒最重要的救世主大教堂改造成了全国最大的游泳池，这一时期的苏联政府对外政策趋于僵化，东正教的活动也暂时被压制了下去。

1985年后戈尔巴乔夫出任苏共中央总书记，他推行的一系列政策如“新思维”和在多个领域检讨苏联此前作为，在宗教方面更是完全另起炉灶，承认教会的合法权益并要求加强与教会的关系，这些都促使了宗教思想的大解禁。1990年10月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了《宗教和宗教组织自由法》，这部法律标志着苏联自1917年以来的宗教政策大转向，宗教团体得到了解禁。到了1991年12月苏联宣告解体以后，东正教徒被允许进入军队服役和参加政府公务工作，充满共产主义特色的十月革命节也为东正教的节日所取代，东正教神学教育迅速解冻并快速发展扩大和向全俄各地渗透；“国家与宗教和解”的浪潮促进了俄罗斯东正教迅速复兴，东正教会重新走向了台前。2003年东正教大牧首阿列克谢二世访问了俄罗斯外交部，会后成立了一个教会和外交事务联合工作组，标志着俄罗斯政教合作以及东正教对俄罗斯对外事务的参与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三、东正教对民族精神的影响及其在外交领域的体现

（一）救世主义的使命感

俄罗斯人的末日论情绪一直很浓郁。根据基督的教义，俄罗斯是在最后一个千年接受了洗礼，末世将至的传说广泛流传于希腊和小亚细亚等东正教世界，进而传播到了俄罗斯的土地上，这也是俄罗斯人性格中末世论的最初来源。

罗马帝国的史诗级分裂造成了古基督教的東西大分野，东正教的中心在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后逐渐转移到莫斯科并辐射到连接了包括东欧、西伯利亚、中亚和高加索在内的广袤地区，这一历史事实在俄罗斯人心中荡漾，唤起了“第三罗马”的理论。这一理论认为，神明赋予世界的使命通过三个世界性王国的兴衰来展现，现在“第一罗马”古罗马帝国、“第二罗马”拜占庭帝国都因为背叛了东正教义而衰落了，存活至今的莫斯科公国就是第三罗马，

东正教信仰的全部前途就寄托于俄罗斯人身上，只有俄罗斯人是真正对上帝虔诚的人；而第四罗马永远不会再有。以这种理论出发，俄罗斯成为了光荣于世却已衰落的古罗马帝国和拜占庭帝国的唯一正统继承人，成为了纯洁的东正教的捍卫者，两大世界帝国的历史任务、东正教的宗教使命都将由俄罗斯来继续承担。如同儒家思想之于中国、清教传统之于美国一样，“第三帝国”理论深深烙印在俄罗斯人民的灵魂深处，使他们形成了深深的救世主义的使命感。

大思想家尼古拉·别尔嘉耶夫指出，俄罗斯人民这种深入骨髓的救世意识与其说是来自于斯拉夫式的民族主义，倒不如说它和东正教的宇宙观念联系更密切一些。在基督教的教义里，基督是为了地面上所有民族而降临在世间，对俄罗斯民族而言，承担了基督的救世使命的唯一民族就是俄罗斯民族自己，因为基督教在西欧已经发生了蜕变，而只有东正教及其所流行的俄罗斯才保留了最初的纯洁性，俄罗斯的一切外交行为，在宗教意义上就是发扬上帝的事业，实现全人类的统一，认为基督教的保卫和复兴是俄罗斯义不容辞的历史使命，这样的一份使命是俄罗斯走向世界、争做世界强国的基础。这样的使命感将俄罗斯的国家利益和宗教热情有机结合起来。俄罗斯人坚信自己的民族是“神选民族”。东正教也一直以基督教正统而自居，认为自己是真正能拯救世界的宗教。19世纪初拿破仑的铁蹄横扫欧洲大陆，然而却倒在了远征俄罗斯路上，这进一步助推了俄罗斯民族的救世意识，他们认为这是对“神选民族”的又一次证明。

东正教救世思想对于俄罗斯政治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十月革命胜利后新建立的苏维埃政府热烈地想把无产阶级革命推向全球，“清扫地球”“解放全人类”的响亮口号，无不体现着俄罗斯人深入灵魂的救世主义。1959年赫鲁晓夫与尼克松会晤时，大胆预言：尼克松的孩子们将在共产主义制度下生活。赫鲁晓夫的语气是那样的坚定，态度是那样的鲜明，可以看出，在他的头脑中仍燃烧着“世界革命”的理想。

（二）权力崇拜的民族心理

东正教从诞生之日起就与政权密切相关，是国家的精神支柱。在拜占庭，东正教会会在每一届皇帝的登基仪式上用涂抹圣油膏的仪式昭告臣民，皇帝的权力源自上帝赐予，通过这种形式实质上是为政权的合法性提供了背书。在东正教的世界中，作为一国之尊的皇帝也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被尊为上帝在人间的代表和教会的最高领袖。东正教在俄罗斯代表的是一种坚定的信仰，然而对于俄国统治者而言，国家政权的运转同样也需要用到东正教作为他们巩固统治地位的工具。在1453年拜占庭灭亡后，俄罗斯沙皇更是打着“第三罗马”的旗号，自命为东正教会的头号领袖。对政治权力的依赖和畏惧融入了俄罗斯思想的深处，这种对皇帝权威的绝对服从也是俄罗斯人民能够接受“强势领袖”的重要缘由。例如在1896年，在莫斯科有数十万的老百姓蜂拥而入霍登广场并造成了上千人被踩踏丧生的惨剧，而他们的目的竟然只是为了抢夺一个镌刻着时任沙皇尼古拉二世之名的圣杯，这个事件充分展现了俄罗斯民众对于统治者的顶礼膜拜。

（三）二律背反的性格特征

与中国人追求的“中庸”不同，两级反转式的反复无常和推倒重来对于俄罗斯人简直是习以为常，非理性和爱走极端就是俄罗斯人性格的写照。“在俄罗斯的政治生活里，在俄罗斯的国家机构里隐藏着一种黑色的非理性因素¹。”如哲学家别尔嘉耶夫所言：“俄罗斯民族只能在极化性和矛盾性上与欧洲民族相比，它是更加直爽和更富有灵感的民族，它不懂得方法而好走极端²。”有一些俄罗斯思想家喜欢拥有这种特点的俄罗斯民族比喻为一座摇摆不定的巨大钟摆，也就是常常瞬间从这一端摆到另一端去，要么全都有，要么全都无³，俄罗斯人总是在两个极端之间横跳而没有折中点。十月革命的胜利使得一夜之间红旗飘满了俄罗斯大地，旧有的沙皇家族和资产阶级统治者几乎是很快就被清算；而到了90年代初的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时期，则又是一夜之间大变天，刚刚还是国家主要政党和主导思想立马被宣布解散和禁止，充满无产阶级特色的广场和纪念碑名称也是在一夜之间全部改名，这种非理性、走极端的行为放眼全世界也是极为罕见的。

俄罗斯人二律背反的性格特征的形成并非是空穴来风，在其背后有着深刻的宗教因素。公元988年的罗斯受洗尽管使斯拉夫人的信仰从多神教改变成了东正教，但这毕竟只是形式上的，为了能真正地走入到民众的内心深处，“外来户”东正教选择了妥协和接纳根深蒂固地存在于罗斯大地上的本土宗教和文化，包括罗斯传统的宗教文化习俗和自然崇拜在内都被以另类的形式融入到东正教自身，并采用和原来的多神教相类似的传教方式以减轻罗斯人民对于自身的疏离感和排斥，比如农民们曾经将治病救人的希望寄托于对多神教的祭祀活动和巫医身上，利用类似于跳大神的仪式求雨或驱鬼，后来东正教会尽管有强烈的意愿同这种愚昧的现象斗争，但还是不得不承继了来自异教的这种仪式，履行和旧教一样的义务。“无限的深邃和非凡的崇高与某种卑贱、粗鄙、缺乏尊严、奴性混在了一起。对人无限的爱、真诚的基督之爱，与仇恨人类的残忍结合在一起，对基督（宗教大法官）的绝对自由的渴望与奴性的驯服和平共处⁴。”东正教的双重信仰与俄罗斯民族二元性格的形成不无关联，俄罗斯民族在保守和坚持自身的“纯洁性”的同时，也有着一股将自身内心深处那股“黑色的、恶劣的、非理性的、阴郁的、不透光的自然力⁵”释放出来的动力。

这种二律背反的特点表现在外交方面，就是政府对待外国态度的“冰火两重天”。以对西方的态度变化为例来说明，在苏联刚刚解体、新生的俄罗斯联邦百废待兴的背景下，俄罗斯上至政府要员下至平民百姓一改旧时与资本主义世界的对立，无不将目光热切地投向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身上，整个俄罗斯社会都沉浸在快速融入欧美大家庭中、通过与西方建立平等友好的关系来促进国家复兴的浪漫情绪之中，俄罗斯政府不但聘请了美国人担任本国经济发展的顾问，还将美国那种自由市场经济体制作为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总目标。1992年叶

¹ 汪剑钊选编：《别尔嘉耶夫集》，上海：远东出版社2004年版，第5页。

² [俄]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2~3页。

³ 杨洁、李传勋：《俄罗斯民族性格基质及其表征》，载《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4年第5期，第16-25页、第95页。

⁴ [俄]别尔嘉耶夫：《俄罗斯命运》，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页。

⁵ 同上，第46页。

利钦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时，在一次讲话中就非常露骨地表示，自己是代表着“世界上最年轻的民主国家”，来到了全世界的民主“圣地”，90年代初俄罗斯对于西方的趋之若鹜由此可见一斑。然而好景不长，向欧美的频频示好得到的只是冷眼相对和敷衍了事，翘首相望的经济援助和市场开放迟迟未至，在美国经济学家“忽悠”下实行的休克疗法又对俄国民经济造成了重创，国民生产总值几乎腰斩，饥寒交迫的人们向欧美伸出去的橄榄枝换回来的并不是春暖花开，而是更加严酷的寒冬，这种落差感之下俄罗斯国民对西方的态度迅速地大反转，崇敬和崇拜变成了痛恨和唾弃，曾经扬眉吐气、红极一时的亲西方派再次变回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这种“两极反转”可以从当时的社会调查和议会选举中看出端倪：当被问及“你是否将美国视为今日俄罗斯的榜样”时，在1991年有32%给出了肯定的意见，但到了1992年这一比例就骤减至11%；倾向于激进改革促进俄罗斯经济自由化的叶利钦在1991年的高票当选总统是亲西方派的一次标志性的胜利，自由民主党也在1993年的国家杜马选举中大获全胜，拿下了大量席位；然而到了仅仅两年后的1995年12月，最大赢家就换成了对西方思想充满冷漠和警惕的俄罗斯共产党，而主张激烈地向西方靠拢的党派这次甚至连5%的得票率都没能拿到¹。

（四）忍耐受苦与尚武重战的习性

俄罗斯人的历史是沉重的，地处东欧大平原、缺乏屏障的保护使得历史上的他们屡遭外界强敌入侵，严酷的自然环境、长期的专制统治和宗教倡导的内在修行造就了他们忍耐受苦的特性，而无论是北欧的侵入还是鞑靼的桎梏，无论是波兰德国的敌对还是奥斯曼土耳其的侵袭，种种惨痛的经历造就了他们尚武重战的习性，以及在巨大的不安全感的驱使下向外不断拓展战略纵深的行为，这种行为进一步加深了周边国家的敌对，这又更促使了俄罗斯人为了扩张领土、争夺战略要地和出海口而不断对外发动战争。俄罗斯的千年历史可以总结为一部对外战争史，一次次的对外征战使俄罗斯人民饱受痛苦，屡次战火洗礼也使俄罗斯人养成了非理性和崇尚武力的性格。接下来我们从宗教视域出发，分析一下这二者背后的宗教因素，以及是如何在俄罗斯外交方面体现出来的。

从宗教角度分析，俄罗斯人的忍耐受苦与东正教十分注重内在的精神体验有关。虔诚的东正教徒们相信，自身的不断修行和臻于至善有助于更加的接近内化于人们内心的神性，因为东正教精神最重要的精神内核就是“接近上帝”，而基督本身就是苦难的象征，他常与世间受苦受难的人们走在一起，为他们指出救赎之路。在近千年的时间里，这种对内在神性的追求促使无数的东正教徒自发地结成苦行僧集团，更有甚者还有鞭笞派和阉割派等，他们都在以圣经故事中基督对苦难的忍受作为自己的精神坐标和效仿目标，不同的形式、甚至为常人不能接受的方式表现着这种对内心深处的神性的追求。“曾有成千上万的俄国人，其中有许多真正的天才，他们为了这一偶像而牺牲了自己的生命，安然的走向绞刑架，走向流放地和囚牢，脱离家庭、财产和官位，甚至脱离心爱的科学和艺术的精神财富……当回想起这些资

¹ 张树华、刘显忠《当代俄罗斯政治思潮》，北京：新华出版社2005年版，第264页。

源为信仰牺牲的殉难者们时，我们不仅仅要为他们的迷茫而感到苦涩，而且应当肃然起敬，即使这种信仰是虚伪的，有害的……后来的俄国革命的可怕的熊熊烈焰就是由半世纪以来的一直珍藏于内心深处的这股信仰之火所点燃的¹。”

忍耐受苦的特性在俄国历史外交场上最典型的例子大概是一战尾声阶段列宁力主新生的苏俄政府同德国及其主导的“同盟国”集团签署《布列斯特和约》。在十月革命胜利后，尽管同盟国集团在西欧逐渐难以抵抗协约国集团的强大攻势，但在东线战场德军对苏俄还是强烈的进攻态势，美英法等国拒绝履行同盟义务出兵救援莫斯科，而是企图坐视德国消灭苏维埃政权。在这种情况下列宁强忍屈辱，在布尔什维克党内力主与德军决一死战的巨大呼声下顶住压力，以“无论面临怎样的损失，保全这个新生的已经开始社会主义革命的共和国高于一切²”的理由主导签署了堪称“丧权辱国”的《布列斯特和约》，拱手送出了包括波罗的海、波兰、乌克兰和芬兰在内的广阔地区、大量人口和海量的钢铁与纺织工业力量。从现实主义的角度看，这当然是苏俄领导人立足于实际、用空间换时间的断臂求生式政治智慧体现；但是换个角度考虑，这又何尝不是东正教徒式的忍耐的体现！一战最后同盟国集团的战败的结果证明了列宁的委曲求全并不会永远存在，因为苏俄很快就废除了这个条约。

而尚武重战的习性大概与“第三罗马”理论赋予他们的弥赛亚式使命意识有关。既然俄罗斯自己已经是最后一个罗马，是古时那种最纯洁的基督教的最后和最忠诚的捍卫者，那就必须不惜一切代价的从这个充满恶意的世界中保全自己，并把这种纯洁的宗教推广向异教徒们控制的广大地域中。这可能并不意味着否定其他民族存在的意义，但斯拉夫民族是最优秀的，因为它是上帝绝对精神在人间的继承者，而在斯拉夫民族中坐拥最辽阔疆域、最庞大人口、最强大地位的俄罗斯，是最有资格去统一所有斯拉夫人及他们所处的土地的。“拯救这些民族，承担拯救行动所带来的苦难”，就是俄罗斯民族的使命意识和优越感所在。当历史的车轮缓缓驶入近代，特别是在拿破仑对外发动的战争遭遇失败后西欧民族主义方兴未艾，民族国家逐渐开始形成，而俄国依然因其内在的世界主义的特色而停留在中世纪古典帝国的形态，这样的事实反过来使在俄罗斯风靡已久的“特殊命运”论更加坐实，俄国人更加坚信自己就是独一无二的拯救者，作为1453年拜占庭陷落后东正教世界唯一的大国，拥有着拯救异教徒和堕落的天主教徒的天赐使命。一旦“来软的”不能实现自己的目标，俄罗斯人会毫不犹豫地“来硬的”，用铁血和拳头让世界见识到“战斗民族”的决心。

我们很难不认为俄罗斯数百年的扩张性对外政策和对东欧中亚地区的经略背后有这种宗教热情的驱动。自基辅罗斯建立至今大约1100年的历史，俄罗斯对外作战的年份就达到了90%以上，特别是在沙俄时期，俄罗斯与周边的20余个国家都发生过或大或小的战争冲突。战争成为了俄罗斯国家运转与人民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部分，在浩如烟海的俄罗斯文学巨著如《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都充斥着热血青年为国征战四方的场面。沙俄时期彼得大帝、叶卡捷琳娜二世等历代沙皇对周边各国的疯狂侵略、以“欧洲

¹ [俄]弗兰克：《俄国知识人和精神偶像》，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87页。

² 高放：《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纲(从19世纪中叶到21世纪初)(连载之十二) 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苦难奠基(下)》.载《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2016年第9期，第30-55页。

宪兵”自居在此自然不用多提，苏联时期积极推行世界革命、以社会主义阵营老大哥自居粗暴干涉各国内部事务的历史也已经是广为人知，事实上现在俄罗斯联邦的对外政策和行动依然是武德充沛。世纪之交对高加索地区反对势力的暴力镇压、2008年快速反应攻陷格鲁吉亚并清算格政府中反俄势力、2012年高调以维和为名义出兵叙利亚帮助巴沙尔政府对抗受北约支持的反对派等无不证明了这一点。

第三章 当代俄罗斯政治家外交背后的东正教因素

一、叶利钦时期外交背后的东正教因素

要讨论苏联解体后东正教在俄罗斯政治生活中的复兴，叶利钦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关键人物。因在苏联解体、俄罗斯独立过程中得到了俄东正教会大力支持¹，在叶利钦总统上台初期，他对于东正教的活动采取了亲近和支持的态度，俄罗斯的主要政策方针也以“向西看”为主旨，将积极拥抱西方“自由民主”社会、尽快融入西方社会作为国家发展的主轴。

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标志着曾经以马列主义为主导思想的“社会主义帝国”一去不复返，这曾一度导致俄罗斯人的自我定位出现了动摇，此时作为意识形态基础的东正教就在俄罗斯人的心灵世界中扮演了“定海神针”的作用，向东正教传统回归也成了现代俄罗斯联邦的精神主题。20世纪90年代初的俄罗斯经济衰退、民生凋敝，社会面临着巨大的危机，与此同时作为冷战“胜利者”的美西方国家发达的社会生活、长期标榜的“自由民主”制度都对处于迷茫和困境中的俄罗斯人民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标榜要建立“从温哥华到海参崴的大西洋大家庭”的大西洋派便应运而生。大西洋派是主张俄罗斯全面西化的主力军，他们认为，俄罗斯和西方文明本质上是同一类型的，俄罗斯应该摒弃历史上长期存在的对西方的不屑和敌对态度，虚心向西方学习、求合作，通过学习市场经济制度和民主制度推动俄罗斯政治体制转型，尽快融入到西方文明之中，最终成为西方政治经济体系当中的一环。时任外交部长科济列夫是鼓吹大西洋主义的得力干将，他曾提出“俄罗斯应当步入最积极发展的民主国家行列，以便在这些国家中占有历史以及地理给我们确定的应有的位置……我们同这类国家完全不存在任何不能克服的分歧和利益冲突，但却存在着同它们建立友好关系、将来建立联盟关系的各种可能性²。”这种态度折射在其主管的外交事务方面，表现为俄罗斯不断强调与西方国家的伙伴关系和同盟关系，频繁地向西方国家示好；在宗教领域，出于利用其整顿和利用意识形态空间、塑造新的意识形态的需要，叶利钦赋予了东正教许多在苏联时期所没有的空间和发展机会，尤其是给予其国内宗教活动的优先特权。在1997年颁布的宗教法中，更是明确承认了东正教在“俄罗斯历史与精神、文化形成发展中的特殊地位”。

叶利钦时代俄罗斯向西方世界靠拢的西化行为尽管在俄罗斯历史上是非常罕见的，但是从东正教中找寻到根基。在东欧盛行的东正教和在西欧盛行的天主教与新教同是从基督教延伸而来，尽管在对教义的理解等方面存在着分歧，但是都信奉同一个基督耶稣，都以同一本圣经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同样肩负着向全世界传播宗教、拯救世界的使命意识，这使得俄罗斯人可以以更宽广的胸襟、更亲近的心态来审视西方文明，在意识到自己与西方文明的巨

¹ 在苏联解体过程中，俄罗斯东正教牧首阿列克谢二世发动舆论力量，呼吁军队保持克制，积极协助叶利钦。教会在危急时刻所给予叶利钦的鼎力支持，使得双方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谊和政治互信。

² 科济列夫：《联盟给俄罗斯留下了一笔糟糕的外交政策遗产》，原载俄罗斯《独立报》1992年4月11日。

大差距、以及“向西看”有可能达到的重大效果后，东正教文明反而会自然地更亲近西欧；这正是大西洋派鼓吹“俄罗斯与欧洲本是一家人”的原因所在，既然一家亲那么理所当然的要加入到“西方文明俱乐部”当中。

叶利钦的东正教情节和行为在俄罗斯社会争议颇多，在全面“向西看”未能取得预期的效果后，于1996年开始了第二任期的叶利钦调整了原有的政策，而是更加着力于经略独联体国家，对后苏联地区各国再次进行“大国攻势”，利用已经建立的机制如“独立国家联合体”和新签订的一系列条约、合作协定等，通过提供安全保障承诺、派遣维和部队进入独联体国家内部等措施，试图重新将东欧和中亚的国家拉拢到自己的势力范围内。在国际热点问题如科索沃问题、伊拉克武器核查危机等也不再唯西方马首是瞻，而是积极以俄罗斯自己的方式介入并谋取利益，与此同时还加强了与中国、印度等非西方国家的交往以促进外交渠道的多元化，并扩大在全球的影响力，这与之前的以西方为外交核心形成了鲜明对比。

回顾叶利钦时代的外交政策可以看出，这种前后迥异的困境主要来自于其试图转型的民族国家身份与东正教信仰基础上的帝国性的矛盾。帝国性的特征在十月革命胜利后并未跟随沙俄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而是暂时隐藏了起来，并在苏联解体后不可避免的再次显露了出来，一心向西方国家的自由民主看齐、以民族国家的蓝图构建新生的俄罗斯联邦，就一定会和帝国性发生冲突，二者不可避免的矛盾也决定了俄罗斯的“向西看”外交政策不可能成功。

二、普京时期外交背后的东正教因素

2000年3月27日，弗拉基米尔·普京出任俄罗斯联邦第三届总统。在宗教领域，普京基本继承了叶利钦的政策和精神，根据实际情况为东正教会提供更多实质性的支持，从而进一步巩固了东正教的地位、实力得到进一步提升，助其影响力进一步扩展，近20年来东正教作为俄罗斯社会生活的精神主导和宗教基础地位不断强化，并成为俄罗斯研究中难以避过的主体。虔诚信仰东正教的俄罗斯民众也将自己的宗教热情和民族认同注入到了对普京的支持当中。“无论是就基督教神学理论还是就俄国史而言，缺少了对东正教因素的考虑，就无法描述俄国社会进程¹。”普京的数次连任和历时长久不曾衰落的受欢迎程度，以及在高支持度和高度集中的权力下所开展的积极主动的外交都可以从宗教方面找寻解释。

普京执政时期对外政策的自信与从容源自于他所掌握的高度集中的权力，这是东正教意识形态下崇拜权力的民族传统心态在现代世俗国家的映射。事实上俄联邦总统手中权力的强化在国家初创时期便已有之，1993年通过实施的宪法赋予总统的权力凌驾于包括国家杜马、政府内阁和联邦法院在内的所有国家机构之上，总统可以轻易地否决杜马通过的法案²，而作为鲜明对比的是国家杜马手中的罢免总统的权力在程序上被宪法所严格限制，实际上成为了

¹ 林精华：《无处不在的身影——东正教介入俄罗斯社会生活试析》，载《俄罗斯研究》2010年10月第5期，108-127页。

² 根据《俄罗斯宪法》第一百零五条规定，国家杜马的议案只需要赞同票达到简单多数就可以提交总统批准，但被总统驳回的话就需要杜马和联邦委员会全体成员的三分之二以上赞成才能再次提交，总统的否决权事实上大大增加了杜马推行法案的难度。资料来源：俄罗斯联邦法律信息官方门户-宪法：<http://publication.pravo.gov.ru/Document/View1>

被架空的权力¹。从结果意义上来说，法律在俄罗斯打造了一位“超级总统”，这并不令人感到意外，反而是说明了帝俄时代东正教所宣扬的对皇权的神化到了现代仍然能起到深远的影响，沙俄的帝国性在俄联邦身上以另一种方式获得了复苏。事实上已经有很多人将今日之总统普京与昔日之神圣沙皇相提并论，东正教会也像昔日亲近沙皇一样地亲近普京，为他的政策提供宗教背书。总统集权的巩固和加强是为普京提供了制度保障，他可以放开手脚大胆地按照自己心中所想去搞外交，而不必太过担心国内可能产生的掣肘。

普京时期俄罗斯对大国地位的追求不断凸显，对周边国家、西方国家、新兴发展国家和亚非拉国家的外交政策都更趋主动，“成为世界权力中心”的意图不断凸显；这些不但是普京基于国际关系现状和俄罗斯国情所做出的现实决策，更体现了东正教“弥赛亚意识”驱使之下深深植根于俄罗斯国家基因的帝国性本能。普京很重视宗教纽带所联系起来的俄罗斯与欧洲的关系，在上台初期就访问了西欧各国，通过大打“精神联结”牌和发挥能源优势等促进了俄欧关系的发展；在国际重大问题如朝核问题、科索沃问题等继续与美国作斗争，但维持着“斗而不破”的状态；在国际上积极与各国发展关系，东方和西方一个都不落下，体现出俄罗斯精神文化所特有的东正教“双头鹰”特征：拜占庭继承了罗马帝国在欧洲和亚洲的大部分领土，以罗马帝国和东正教使命最后继承者自居的俄罗斯也是身兼东西两方的王者。

作为一名东正教徒，除了对宗教的虔诚和向外推广东正教的热情之外，普京还深刻地认识到东正教之于精神文化领域的重要作用。他把东正教作为一个特殊而有力的工具，认为宗教是保持现实与历史之间联系的强有力的纽带，要想实现俄罗斯的全面振兴，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实现俄罗斯传统价值观和道德观的全面复苏。2000年普京发表《千年之交的俄罗斯》，在这篇文章中普京提出“俄罗斯必须具备一些基本的价值观，即我们的爱国主义、我们的文化、我们的宗教²”；随后更进一步明确了主流意识的定义，指出主流意识应该是“国家主义、反西方主义和以东正教为基础的传统主义³”。普京有意地将自己作为国家政治领袖和东正教徒的身份进行绑定，他多次出席东正教的活动并强调自己作为“虔诚的正教徒”的身份⁴，在2007年的一次全俄记者会上，普京甚至把宗教的地位提到了与核子能战略一模一样的高度，他表示“俄罗斯的传统宗教与核能战略是巩固国家体制的两张护盾，是对内保持稳定和对外保持竞争力的必要前提⁵”，作为软实力和硬实力的重要构成，人民的精神团结、道德准则的一致与政治经济的稳定同样地重要。在2008年大选后转任俄联邦总理后，普京仍然发言期望东正教会可以在加强国家和海外移民之间关系中发挥独到的作用。这套在西方眼中颇为保守

¹ 根据《俄罗斯宪法》第九十三条规定，国家杜马对总统的弹劾只有在最高法院认定总统犯有叛国罪或其他重大罪行的情况下才能开始，程序上需要不少于 1/5 的议员提出动议、不少于 2/3 的议员赞成，并要得到杜马专门委员会和联邦委员会的一致赞同。在上述机构长期为总统所在的统一俄罗斯党成员所把持的情况下，国家杜马弹劾总统的权力事实上是只存在于法律条文中的虚权。资料来源同上。

² [俄]普京：《普京文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2 年 11 月版，第 35 页。

³ 同上，第 55 页。

⁴ 早在 2001 年，普京的精神顾问就对希腊媒体证称，普京是真正的东正教徒。2003 年在纽约会见国外俄罗斯东正教会牧师时，普京告之说：“你们正与一位信仰她的总统坐在一起。”在 2008 年的一次演说中，普京声称，国家万分感谢俄罗斯东正教会，数世纪来他保护了俄罗斯文化，保证了俄罗斯道德复兴。

⁵ 郭昕宜：《俄罗斯：普丁与 2008 年的前夕》，台北：石英出版社，2007 年，第 60 页。

的价值观，与俄罗斯东正教教会内的保守派所一直提倡的观念却不谋而合。

第四章 东正教影响俄罗斯外交的现实表现

一、整合后苏联地区，保持意识形态主导

所谓后苏联地区，指的是除波罗的海三国以外的原苏联 12 个加盟共和国组成的、囊括东欧、南高加索、中亚在内的广阔的地理空间。在苏联解体之初，尽管俄罗斯失去了超级大国地位，但它仍保留了对后苏联地区国家的深刻影响力以及对政治生活的决定性影响。然而在苏联解体 30 年后的今天，俄罗斯对于这些地区的控制力已经摇摇欲坠、难以维持：格鲁吉亚与乌克兰早已与俄反目成仇，阿塞拜疆逐渐亲近土耳其，哈萨克斯坦等中亚国家积极推行“多元化外交”，近年来的纳卡冲突、白俄罗斯内乱等更是令俄罗斯感到心力交瘁、进退失据。

在此背景下，利用共同的东正教信仰对上述地区进行再整合、保持意识形态主导地位成为了俄罗斯的现实选择。东正教向度是几百年来俄罗斯外交的一贯传统，对于当今俄罗斯当权者而言，俄罗斯的文化辐射现状显然与他们所预想的有着不小的差距：东正教辐射的范围应该包括整个斯拉夫人的地区和历史上沙俄曾经征服的地区，这是一片极其辽阔的土地，不仅仅包括俄罗斯自己，还有乌克兰、白俄罗斯、南高加索和摩尔多瓦，这也正是许多激进的俄罗斯政客主张“接受新的领土”，对于俄罗斯政府而言，即使不取得上述地区的控制权，至少也应整合上述地区的精神空间，建立和保持俄罗斯对他们的意识形态主导，东正教显然可以成为一个得力的工具。

东正教会还在俄罗斯一些涉及历史问题的意识形态斗争中发挥着作用。如发生在 1929 年至 1933 年的乌克兰大饥荒，造成了数百万乌克兰人民饿死的人间惨剧，一直以来都是俄乌之间难以弥合的巨大伤痕，与乌克兰方面一直将其描绘为“莫斯科对基辅的残酷剥削与迫害”相对，俄东正教会尽管表示尊重饥荒受害者的记忆，但将这段历史置于更广泛的苦难框架之中，即与同时期发生在苏联其他不同加盟国家和地区之间——包括伏尔加河流域、西伯利亚和哈萨克——的相似的苦难联系起来，强调这不是独属于乌克兰、而是属于苏联人民的共同苦难历史。华沙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助理教授阿丽希雅·库拉诺维奇博士对此认为，俄罗斯东正教会如此主张之意在于配合俄罗斯政府整合后苏联地区的努力，努力地淡化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历史问题和情感隔阂，保持俄罗斯在原苏联地区的意识形态主导¹。2007 年俄罗斯东正教会与外交部合作成立了“俄罗斯世界”（Русский мир）基金会，旨在“支持促进俄罗斯文化、价值观和精神基础的巩固与发展”。

二、积极开展软实力外交，扩展在东正教世界影响

自苏联解体后的 30 年时间里，东正教会与俄罗斯联邦政府的合作交流一直处于很高的水

¹ Alicja Curanović: “Religion in Russia’s Foreign Policy”, *New Eastern Europe Issue 3(VIII) “Why Culture Matters”*, 2013, p.3-8.

平：这主要得益于东正教本身在俄罗斯的影响力超群，许多政府要员本身就是东正教徒，与教会的频繁接触本身就为他们所乐见；另一方面正如上文所言，政府要员深刻认识到东正教对于政府政策执行的巨大辅助作用。截至目前双方已经建立了高水平、多层次的联系和机制，东正教会也通过一系列文件，包括《俄罗斯东正教教会章程》《关于符合交规交往的法令》等等阐述了其在俄国境内外开展宗教活动的指导原则和思想。

俄东正教会力图在全世界范围内保持俄罗斯的文化影响力和感召力，利用自己在同教间的作用来缓和同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关系，这也与普京上台后主推的国家“主权民主”战略相呼应。在一系列文件和思想指导下，俄东正教会积极经略东正教世界，以“东正教世界的捍卫者”自居开展软实力外交。在具体实施层面，俄罗斯东正教会举办各种神学交流会、研讨会和培训班，推行自己的价值观；国外的东正教会也积极配合俄东正教会的传教活动，向俄派遣神职人员学习聘请俄罗斯神学人士前来讲学等。除此之外，俄罗斯东正教会还致力于在全世界范围内保存俄罗斯式的文化遗产和语言，如在 2006 年和 2008 年分别在朝鲜和古巴建设竣工东正教堂，其中在古巴的竣工仪式上还请到了时任古巴国家首脑劳尔·卡斯特罗的亲自出席。不仅如此，同样在 2008 年俄东正教会还配合俄政府共同策划举行了有拉美七国参与的“俄罗斯宗教文化活动日”¹，这些活动既帮助俄罗斯东正教会促进了与拉美地区国家的文化交流和友好关系，而且也有力的配合了俄政府为了回敬美西方国家针对俄罗斯的和平演变和文化渗透，将文化反攻之火烧到美国“后院”的政策与行动。通过这一系列活动，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了以东正教为基础的保守主义，使其不但成为现代俄罗斯的意识形态基础，更在东正教世界内产生了重大影响。

俄罗斯宗教界的这种软实力外交取得了相当的效果，例如法国许多科教界和政界人士就相信俄罗斯对叙利亚危机的干预是为了保护“东方基督教”免被伊斯兰化²。叙利亚处于南高加索到中东的过渡地带，当地居民具有悠久的东正教信仰史，俄罗斯政府和东正教会在叙利亚长久展开办学和教育宣传活动，在两国之间形成了一道独特的精神文化纽带。俄东正教会也很重视在这样的“传统势力范围”内保持影响力，2011 年基里尔牧首在访问叙利亚期间发出呼吁，要在中东各教会之间以及基督信徒和穆斯林之间展开对话。“我为叙利亚的繁荣昌盛与和平、为基督信徒和穆斯林保持良好关系祈祷”并祝愿“维持俄罗斯教会和安提约基亚教会之间的弟兄友爱关系”“他们要一起为自己的信徒同上主求恩宠³”。牧首等人员在东正教世界的密集访问和谈话都是东正教会积极开展软实力外交的体现。

三、俄罗斯东正教会积极参与外交事务

俄东正教会的参与外交事务同样应该分不同时期讨论。在沙皇俄国时期，东正教会对外的作用并不明显，主要是用于扩大国家的影响范围；在苏联时期特别是管控较为放松的 1945-50 年代，教会被赋予了一定限度的对外自由度，这一时期东正教会对外主要是维护与伊

¹ 张雅平著：《东正教与俄罗斯社会》，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年版，第 196 页。

² 冯玉军、文龙杰著：《俄罗斯保守主义价值观外交评析》，载《国际论坛》2023 年第 1 期，第 139-154 页、第 160 页。

³ 数据来源：梵蒂冈广播电台官网：http://www.radiovaticana.va/ci2_rg/2011_11_16.html 2023 年 1 月 23 日访问。

斯兰世界、希腊和梵蒂冈的关系，以保持苏联的良好形象，为冷战背景下的苏联外交增添更大的余地。到了俄罗斯联邦时期特别是进入了新世纪以后，东正教会对外交事务的参与更加的积极，其参与外交的目的主要在于找回曾经在后苏联地区的文化影响力和宗教感召力，并践行俄罗斯所自豪的“维护正教信仰”的使命，抵制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文化入侵和和平演变，助力俄罗斯成为世界政治中的重要一极。

2002年，俄罗斯外交部代表俄联邦政府与俄东正教会签订了正式协作书，外交部发言人在签订仪式上表示，此番合作旨在促进双方共同实施一系列对外政策计划，这主要是指

俄罗斯东正教会的对外立场业已与政府的外交立场接近同步，即：强调俄罗斯的独一无二的欧亚文明属性，在多极化的世界中谋取有利的大国地位。与官方口径一致，教会同样反对美国主导的全球化，并积极与国家合作促成反西方的统一阵线，强调建立多极世界的重要性。如在2015年9月30日俄罗斯决定开始对伊拉克和叙利亚部分地区盘踞的“伊斯兰国”组织(ISIS)展开空袭后，俄东正教会几乎是立即响应并支持政府的决定，教会公共事务部公开向媒体表示“与恐怖主义的斗争是一场圣战，今天我们的国家可能是世界上最积极的反恐力量”，牧首基里尔在一份官方声明中称武装干预是必要的，因为“政治进程并没有给无辜人民的生活带来任何明显的改善，他们需要军事保护”，并表示将会与包括佛教、伊斯兰教和犹太教在内的其他在俄罗斯盛行的主要宗教力量发表联合声明支持政府在中东的军事行动¹。这样的积极配合政府的态度显然使俄罗斯领导人很满意，2017年普京在访谈中表示希望“俄罗斯东正教会能够利用自己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在团结国际社会共同复兴叙利亚，为叙人民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和恢复被毁坏的文化中心提供一切可能的帮助²”。2023年3月31日普京授权发布的新版《俄罗斯外交政策概念³》中提有一句话十分引人注目：“真正巩固国际社会的努力需要一套共同的价值观、一个共同的道德标准作为联合行动的基础，世界主要宗教都有始终共享包括追求和平与正义、尊严、自由与责任、诚实、同情心和职业道德等原则和概念的权利”，这种将共同价值观和世界宗教相结合的表述很可能是克里姆林宫借鉴了俄东正教会的有关表述并将其纳入到外交政策概念中。

综上所述，俄罗斯东正教会对于外交事务的涉足仍然以配合国家的外交目标为主旋律，而作为政策制定者的俄罗斯当局显然也乐见东正教会作为自己在精神文化领域的战友发挥其自身独特的作用。

¹ 数据来源：拉伯卫视台官网：

<https://english.alarabiya.net/News/middle-east/2015/09/30/Church-says-Russia-fighting-holy-battle-in-Syria> 2023年1月21日访问。

² 数据来源：俄罗斯卫星通讯社：<https://sputniknews.cn/20171201/1024188236.html> 2023年1月27日访问。

³ 俄罗斯领导人制定外交政策总的纲领性文件，曾多次发布更新。

第五章 东正教影响俄罗斯外交的根源分析

一、东正教自身发展的需要

如前文所述，东正教与俄罗斯国家政权之间有着千年的羁绊。尽管在现代俄罗斯东正教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空间和成就，但是它显然不想仅仅停留于此，而是希望进一步扩充自己的势力，并在政治生活里获得更多话语权。当我们回顾历史时可以看到，当教会自觉地把自身的前途与命运和国家利益绑定在一起的时候，就更能得到当局的支持；如果政府和教会产生龃龉和矛盾时，往往就意味着政府对教会的打击和弹压将不可避免，教会因此而丢失掉自身的独立性。在总结了自身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东正教会选择了与政府合作，这也就意味着参与并支持政府的对外政策制定和对外行动的实施。东正教会的身影活跃在地缘冲突高发的地区，如在 2011 年爆发的叙利亚危机中和 2014 年开始猖獗的中东“伊斯兰国”引发的危机中，东正教会就积极出面对在冲突地区的基督教徒人身安全表达严重关切，并积极致函联合国秘书长和叙利亚教会进行斡旋，还打破成见与伊斯兰世界的人员进行沟通协作，这些行为既为俄罗斯出动维和部队和武装力量介入提供了理由，也为维持冲突地区局势的稳定和无辜平民的生命安全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 2014 年以降俄乌关系不断走向冰点的背景下，莫斯科东正教会也与基辅教会展开了宗教领域的另类“斗争”，二者在 2018 年宣布决裂，被视为俄乌关系持续紧张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在 2022 年俄乌冲突爆发后，俄罗斯东正教会牧首更是专门设立了一个新的高级教会职位，负责对前线作战的士兵和俄罗斯安全部门成员进行精神指导，这都是东正教会积极在外交领域发挥自身独到作用的体现。

除了服务于国家外交军政大计之外，俄罗斯东正教还有一个重要的使命，就是保持和发扬俄罗斯文化在全世界的影响力。1917 年十月革命胜利后，苏俄大地反对传教士和教堂的混乱局面迫使部分僧侣逃往国外，俄罗斯东正教就此分裂：在海外的被称为“白色东正教”，国内的称为“红色东正教”，尤其是当本土东正教 1927 年正式承认苏共政权后，双方的对立达到顶峰。经过东正教会的不断努力和总统普京的多次撮合之下，2004 年实现了海外“白色东正教”教会成员团访莫斯科并与“红色东正教”教会人员共同参拜、2006 年八次会谈形成了一系列的文件，促进了双方弥合分歧和不断走近；终于在 2007 年 5 月 17 日，俄罗斯东正教“红”“白”两派在经过了近一个世纪的分别之后在莫斯科合二为一，俄罗斯海外教会在保留了在教务、教育、财政等方面的自主权的前提下宣布合并成为莫斯科牧首区的一部分，在国家关系、教会成员活动原则、教派组织关系等方面统一了认识和对外口径。红白教会合并的盛事在俄国国内引起了强烈的反响，由于东正教会的百年分裂肇始于苏联的建立，不少东正教徒将其视为消除历史苦痛、真正从 20 世纪的苦难中走出的契机。这一合并也标志着俄罗斯东正教会开始了自己的统一化进程，俄罗斯世界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团结。除此之外，东正教会还积极走出俄国，在拉美等国开展宗教活动，对提升俄罗斯文化竞争力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二、现实政治的需要

俄罗斯当局也需要东正教的力量。叶利钦、普京和梅德韦杰夫的就职仪式都是在东正教大牧首出席的情况下举行的，俄总统普京在就任伊始时就表示，无论是谁在俄罗斯执政掌权，也无无论在治国决策中依据的是什么样的意识形态，都会利用到东正教的基本原则¹。”

（一）东正教是俄罗斯实施大国外交战略的精神支柱

俄罗斯位于广袤的东欧平原上，在历史上曾数次遭受鞑靼奥斯曼波兰北欧等强敌的入侵，特殊的历史和地理背景使得俄罗斯人一直严重缺乏安全感和对外部世界的信任感，为消除这种不安全感，俄罗斯习惯的做法是主动出击，通过对外扩张来为自己创造“缓冲空间”，而东正教的救世主义正好为俄罗斯的扩张行为披上了宗教的外衣并提供合法性。如 17-19 世纪俄罗斯与奥斯曼土耳其之间为争夺包括南高加索、黑海沿岸、克里米亚和巴尔干半岛共爆发了 10 场大规模战争，几百年间沙俄当局一直以“抵御异教徒、极力捍卫东正教”的旗号为自己的军事行动提供合法性²；18 世纪下半叶沙俄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也利用波兰居民中的天主教徒、新教徒和东正教徒的宗教信仰矛盾，以保护东正教徒为由挑起了对波兰的战争，此后又故技重施伙同普鲁士、奥地利三次瓜分波兰。东正教是沙俄政府从精神上同化被征服地区人民的工具，也是保持和增强外交影响力、感召力和威慑力的一把利器。

苏联时期尽管奉行无神论、并对境内包括东正教在内的宗教及其活动予以打击和限制，但并非完全弃之不理。卫国战争时期，作为国家元首的斯大林就号召“在国家主权受到威胁的情况下，国家迫切希望教会成为共同对敌的同盟者，成为国家反法西斯力量的坚实后盾，而不是袖手旁观的力量³。”广泛利用包括东正教在内的一切力量，是苏联最终战胜法西斯势力的关键。

1991 年苏联解体后，紊乱的社会秩序、萧条的社会经济使俄罗斯人民一度对新执掌政权的联邦政府及其各级地方政府和机构失望至极社会中不安定因素大大增加，失去群众基础的政权岌岌可危。对现实政权和生活失望至极的百姓转而投入教会“怀抱”，希望从上帝那里得到慰藉东正教会因此得以恢复和扩展自己在俄罗斯民间的影响力。另一方面，从世界顶端跌落下来的巨大失落感很快被不甘的怒火所取代，“追寻过去的荣耀”成为了俄罗斯社会的主要诉求。俄罗斯共产党领导人久加诺夫在媒体上表示，“要么是我们（俄罗斯人）重新控住世界地缘中心，要么是我们走向被殖民的黑暗未来。”他说“在长时间的历史实践中，俄罗斯民族向全世界展示了那种在个人和社会生活方式中所体现着的、在稳定的社会结构和强大的帝国基因中蕴含着的人类宝藏，也就是第三罗马理论。”莫斯科国立国际关系学院军事政治研究

¹张梅著：《当代俄罗斯东正教复兴情况研究》，载《西伯利亚研究》，2008 年第 1 期，第 43 页。

²О. Л. Церпицкая, “заимодействие Русской Православной Церкви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в мировом сообществ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СПбГУ*,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Златоуст,2006. p14.

³潘祥辉著：《弥赛亚主义:苏联政治传播对东正教传统的因袭和转化》，载《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6 年第 2 期，第 44-54 页。

中心主任波德别列兹金具体的规划了“复活俄罗斯帝国的路线图”：首先是“用和平民主的方式，重建俄罗斯在 1990 年的疆域”，然后是以此为基础“建立全东斯拉夫民族的大帝国”。对俄罗斯当局而言，由于东正教与俄罗斯民族文化已融为一体，受东正教影响、进而利用东正使教的力量为己所用也是势在必行。俄当局把东正教奉为其民族的象征和大国外交战略的精神支柱，实际上是为了借助东正教重新整合民族精神、增强民族凝聚力，以争取获得越来越多民众的支持。

（二）救世主义的使命感是对外政策争取民意的关键

如前文所述，被称为“弥赛亚使命”的救世观念是俄罗斯民族性格的重要特征。以欧亚文明自居的他们认为自己有别于西欧的文明，俄罗斯在历史上阻挡了来自东方的侵略，是所谓的“文明世界”的保卫者，也是欧洲和世界的拯救者。这种心态进一步影响了俄罗斯对于自身的定位，即自己是一个独一无二的民族，生来就是为了拯救这个世界，也只有俄罗斯民族才能拯救世界。俄罗斯伟大作家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曾有名言：“真正伟大的民族永远也不屑于在人类当中扮演一个次要的角色，甚至也不屑于扮演头等角色，而是一定要扮演一个独一无二的角色。一个民族若是丧失了这种信念，它就不再是一个民族了。”

这种大国心态和救世情结为俄国当局所利用，使其成为了对外政策争取民意的关键。以俄罗斯介入叙利亚危机举例，自 2011 年危机加剧以来，俄罗斯的介入程度就在不断加深：最初的提供武器和物资援助、到之后在包括联合国大会的各种国际场合大力声援叙利亚政府，与美西方国家针锋相对；再到 2015 年直接派遣力量介入叙利亚危机，这一系列行动当然离不开对国内民众支持的争取，在 2013 年 1 月俄罗斯民意调查机构列瓦达针对当时俄罗斯社会的态度作民意调查，显示多达 51% 的俄罗斯民众不同情叙利亚冲突中的任何一方，包括俄罗斯政府支持的叙利亚现政权¹；随后俄罗斯政府有意加强宣传叙境内的宗教冲突和俄东正教会在叙所做的对基督教堂的恢复与对叙基督教徒的保护工作，将俄罗斯介入叙利亚内战的动机形容为“与极端势力对基督教徒的迫害作斗争、帮助解决叙境内的人道主义危机”。这些充满救世感的宣传在俄罗斯社会产生了显著效果，尽管俄罗斯国内经济民生随着介入危机程度加深而不断下降，俄罗斯民众对于俄当局及其支持的叙利亚现政权好感仍明显提高，到 2015 年 10 月全俄社会舆情中心作的民意调查显示 52% 的俄民众支持俄罗斯当局保护叙利亚现政权，66% 的民众支持俄罗斯军方在叙境内采取的军事行动²。2022 年 2 月 24 日普京在对乌克兰发动特别军事行动前面向全国发表的讲话中也着重描绘了基辅当局迫害乌东俄罗斯裔的行为以及对于俄罗斯光荣历史的背叛，以此为抓手试图唤起俄罗斯人民对乌东人民的同情，从而为接下来宣布承认乌东两州独立造势。

¹资料来源：俄罗斯列瓦达中心官网：<https://www.levada.ru/2013/08/28/obshhestvennoe-mnenie-o-situatsii-v-sirii/> 登录时间：2023 年 1 月 26 日。

²资料来源：全俄民意研究中心官网：https://wciom.ru/fileadmin/file/reports_conferences/2015/2015-10-09-siriya.pdf 登录时间：2023 年 1 月 26 日。

（三）爱国主义情结是巩固意识形态防线的中流砥柱

东正教塑造了俄罗斯人的自尊，东正教信仰提升了俄罗斯民族的凝聚力。苏联解体后东正教全面回归俄罗斯社会，俄罗斯民众的“大国心态”也全面复苏。“大国心态”使俄罗斯人认为俄罗斯在世界秩序中具有独特而不可取代的地位，是一个承担着历史性使命的伟大国家，代表着世界的方向和未来。这种心态在对外政策上表现为：“大俄罗斯主义”倾向和对本国利益的高度的、几乎具有排他性的关切。因此俄罗斯人仰慕铁腕人物，乐见对敌对国家以硬碰硬、捍卫本国防线，这强烈的爱国主义情结为俄罗斯制定强硬而进取的对外政策提供了强大的支持。沙皇俄国时期即表现出了强烈的大国沙文主义色彩，苏联时期更是视自己的利益为社会主义阵营最高利益，一方面与美国争霸，一方面粗暴干涉别国内政；现代俄罗斯联邦则以扩展自身在世界和地区的影响力作为对外政策的主旋律。

东正教信仰如何与俄罗斯人的爱国主义自豪感紧密相关？这可以从2009年底俄罗斯国家杜马（即俄罗斯联邦的下议院）的一次争辩中窥得一二。当时俄罗斯共产党的一名议员提出议案修改俄罗斯国歌的歌词，将“（俄罗斯）你是上帝保佑的沃土”改为“你是我们保佑的沃土”，也就是去除其中的“上帝”字眼。这名议员认为作国歌为国家的标志不应该出现宗教因素，即任何宗教都不能凌驾于国家机器之上；然而他很快陷入到了大多数议员的攻讦之中，愤怒的人们指责他删除“上帝”字眼是别有用心，甚至要求将他驱逐出境¹。因为经历了近二十年的东正教复兴和对90年代叶利钦讨好西方却碰一鼻子灰的失败教训之后，东正教领袖所说的“俄罗斯的民族理念不能去千里之外去发现，重要的是要回归历史上纯净心灵的信徒的生活准则²”已经十分地深入人心，东正教在千年的发展中具有了明显的斯拉夫性格特征；做大国、做强国，是俄罗斯国家、人民和东正教的统一认同，正是这样的认同使得国家机器、人民群众和宗教力量联结成了一股绳。

从奥斯曼土耳其到普鲁士，从纳粹德国为首的轴心国集团到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俄罗斯面对强大而敌对的外国势力针锋相对、剑拔弩张；从彼得大帝到斯大林再到普京，越是对外强硬的领导人越能得到俄民众的欢心。团结在东正教旗帜下的俄罗斯人所迸发的强烈爱国主义情结，正日益成为俄罗斯巩固自身意识形态防线、抵御西方攻击与侵蚀的中流砥柱，受此影响下的对外政策也越来越明确维护自身大国地位和利益的目标，并采用日趋强硬的手段来维护这一目标。

¹ 资料来源：青年参考网：http://qnck.cyol.com/content/2009-12/01/content_2962878.htm 访问时间：2023年3月1日。

² Ирина Каргина, “Религия и конфликт: современные вызовы и теоретико-методологические перспективы социологии религии”, Москва: РОССПЭН, 2007, p.23.

第六章 案例分析——乌克兰危机中的俄罗斯

一、乌克兰危机爆发的东正教背景

为了更直观地研究当代俄罗斯外交政策中的东正教因素，引入一个具体的案例是很有必要的，笔者认为再没有比绵延日久、现在更是成为全球关注焦点的乌克兰危机更适合作为这个案例的了，这一方面是因为俄乌关系是对俄罗斯最为生死攸关的对外关系之一，对乌克兰问题的处理直接关系到俄罗斯国家核心利益的实现，通过对俄罗斯对乌方针与行动的分析，我们能够更加直接地抓住问题的关键；另一方面，发源于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基辅罗斯是俄罗斯文化之根，乌克兰对于俄罗斯人而言不亚于“中原”之于中国、耶路撒冷之于犹太人和阿拉伯人，是具有特殊宗教意义和精神寄托的心灵港湾，对于研究者而言可以很便利地把握其背后的宗教因素；此外，俄罗斯在乌克兰危机中的一系列决策既是普京总统近 20 年来领导俄罗斯秉持思想的集中体现，更是俄罗斯联邦立国 30 年来所处理的最重大、时间最长的外交事件，充分研究这一问题对于我们更准确地把握俄罗斯外交政策背后的精神文化因素具有很重要的价值。

（一）身份认同之争：弥赛亚意识与自我意识的冲突

乌克兰危机的爆发过程与俄欧矛盾息息相关：2013 年末时任乌克兰总统亚努科维奇为强化对俄关系而计划中止与欧盟的经济自贸协定，引发了乌国内大量亲欧群众的抗议示威，剧烈的社会动荡不但导致了亲俄的亚努科维奇政权被推翻、乌政坛开始被亲欧势力所把持，还导致了国内亲俄和亲欧势力的大分裂，亲俄的克里米亚和顿巴斯地区宣布独立并与乌克兰政府军发生交火，标志着乌克兰危机的正式爆发。在乌克兰危机发酵期间，俄罗斯积极维护在乌俄族人的利益，声讨谴责乌克兰亲欧派及其背后的西方势力，并顶着西方强大的制裁压力占领了克里米亚半岛，支援乌东四州亲俄民兵与乌军的作战，到了 2022 年初更是以要求“去军事化”为由出兵乌克兰，由此推动乌克兰危机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

俄罗斯对乌克兰方面明示的强硬原则和手段，根本原因在于它视后者为自己的核心利益。如同前文所述，后苏联地区特别是东欧是俄罗斯几百年以来的核心势力范围区，是当代俄罗斯的安全底线所在，以宗教式强烈的“自我认同”和帝国架构出发，要想同不怀好意的西方世界对抗、进而谋求自己的世界强国地位。巩固在这些利益辐射地区的主导地位是最基础的也是最必要的。

东正教弥赛亚式的使命意识使俄罗斯无法接受乌克兰的西化倾向。基辅被誉为“俄罗斯所有城市的母亲”，988 年发生在这里的罗斯受洗是东正教在俄罗斯落地生根、俄罗斯民族自我意识生成的开端，俄乌两国在这里有着相同的身份认同和民族记忆。正如普京在 2022 年 2 月 21 日面向全国的讲话中所称：“对我们来说，乌克兰不仅是邻国，而且是我们自身历史、

文化和精神空间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仅是我们的同志，亲人中的同事和朋友，还是血缘和家族纽带相连的亲戚¹。”然而乌克兰的文化认同并不是完全和俄国人一致，与东乌地区长期处于俄罗斯主导的东正教文化圈所不同的是，西乌克兰地区则是一直浸淫在西欧主导的天主教文明中，这种文化上的差异造就了今日自我定位的不同，也就是“亲俄派”和“亲欧派”的矛盾缘起。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近30年西方政治经济实力和文化的全面压制俄罗斯的情况下，再加上西方处心积虑地进行文化渗透与扶持代理人，乌克兰亲欧派的逐渐壮大并促使国家全面“向西看”就是一个必然结果，“这是国家的标准，走向世界文明的通途²”，而这显然与一直以来压制乌克兰找寻自我身份、强调自身影响力和与乌克兰亲近关系的俄罗斯产生了巨大的冲突，俄罗斯普京政府充满愤怒地将这种脱俄入欧的行为称为“恐俄症”甚至是新纳粹主义——这是一个相当严重的质控，折射出来俄罗斯的态度有多么决绝。从这个角度来看，俄罗斯不惜一切代价保卫在乌利益颇有一种“国家虽大但是无路可退，因为身后就是莫斯科”的悲壮味道。

（二）思想分道扬镳：莫斯科与基辅教会的分裂

东正教是连接俄罗斯与乌克兰的心灵纽带，而莫斯科和基辅教会之间不断扩大的矛盾最终将这条纽带撕得千疮百孔，成为了俄乌冲突在精神文化领域的延伸。正如我们前文提及东乌克兰和西乌克兰在文化认同上存在根本性差异一样，东正教会在乌克兰也不是统一的，而是分为几大支系：最主要的一支是隶属于莫斯科大牧首的乌克兰东正教会，作为东正教在乌最正统的组织，该教会使用俄语作为官方语言，因此在乌东非常流行，人数也是最多；另外还有隶属于基辅大牧首的东正教会，代表的是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和居住在西乌的居民。由此看来俄乌教会的纷争可能早早就埋下了种子。

在乌克兰危机爆发后，粉墨登场的亲欧派当局便将乌教会的独立性与国家尊严和民族独立扯上了关系。时任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积极要求与俄东正教会作切割，为此他多次前往东正教世界里拥有“荣誉上的首席地位”的君士坦丁堡牧首区积极斡旋，要求乌克兰教会从莫斯科的“钳制”中摆脱出来，获得更大的自主权³。

君士坦丁堡牧首终于在2018年10月决定赋予乌克兰教会以独立自主的权利，随后乌克兰国内几大东正教会的支系召开会议宣布统一，并建立全新的“乌克兰东正教会”。由于新成立的教会实际上是由那些不被莫斯科承认的教徒所主导建立的，标志着乌克兰东正教会正式与俄罗斯教会决裂。莫斯科牧首区谴责这是乌克兰“纳粹分子”和欧美主子联合君士坦丁堡牧首区对莫斯科发动的阴谋，因为君士坦丁堡牧首区和莫斯科牧首区是东正教世界两大擎天柱，此举极像是借机打击削弱莫斯科以提高自己的地位。莫斯科方面针锋相对地提出了反制的措施，取消了与君士坦丁堡牧首区和一切支持乌克兰教会独立性的其他教会之间的圣事活

¹ 资料来源：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官方网站：<https://sputniknews.cn/20220222/1039477263.html> 访问时间：2023年1月28日。

² [乌]列昂尼德·库奇马：《乌克兰：政治、经济与外交》，东方出版社2001年版，第172页。

³ 刘博玲：《2018年俄罗斯政治进程中的宗教因素》，载孙壮志主编：《俄罗斯发展报告（2019）》，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第72页。

动，并威胁要单独到像非洲这样的东正教空白区域建立教区，以“分裂”阻止“分裂”。¹俄罗斯政治领导人也下场声讨这种分裂行为，2019年11月俄罗斯外交部长在会见希腊外长后表示，美国正在毁坏俄罗斯和乌克兰的东正教体系，如果没有美国的支持，乌克兰分裂派系教会的创建是不可能实现的²；2018年底普京在年度记者会上也秉持相似的看法，他说：“你简直不能想象美国国务卿会给基辅打电话支持乌克兰东正教的分裂，这是政治在干预宗教自由³。”政治家的言语表明这场教会大分裂已经不只是东正教世界内部的动荡，还和俄乌地缘政治局势与美俄角力紧密相关。

以现在的眼光来看，五年前的这一宗教大分裂虽未得到东正教世界以外的过多关注，却充满了预言的意味：它似乎是在向世人昭告，兄弟反目、祸起萧墙的悲剧已经在东欧上演，它加剧了俄乌之间本已非常紧张的局势，并成为了2022年俄罗斯下定决心出兵乌克兰的一大缘由。

二、俄罗斯行动背后的东正教因素

（一）“拨乱反正”：弥赛亚意识促使俄罗斯力阻乌克兰西化

在弥撒亚意识的指引下，俄罗斯坚信乌克兰和自己本是一家，是目标构建的“大俄罗斯”不可缺少的部分，强调俄乌之间的血脉联系和共同历史文化底蕴。而在乌克兰看来却不是这样，事实上近几百年间乌克兰数次试图从俄罗斯的辐射范围内走出来，诸如17世纪哥萨克领导的乌克兰民族大起义、1917年沙俄覆灭后乌克兰内部独立建国的思潮等，都是力图挣脱东正教旗帜下俄罗斯帝国架构的尝试。在苏联解体后乌克兰终于取得了独立，在欧盟扩员、北约东进的形势下乌克兰内部的亲欧派推动着国家不断向西转。

乌克兰的西化显然构成了对俄罗斯帝国底蕴的挑战，在亲俄的亚努科维奇总统被支持加入欧盟的乌克兰抗议民众席卷下台后，忍无可忍的俄罗斯终于决定出手，无论是接纳克里米亚入俄，还是高调屯兵俄乌边境、武装支持乌东四州亲俄民兵，乃至2022年初“特别军事行动”的全面展开，俄罗斯的出手不可谓不强硬，甚至带有一种宗教式的狂热和不计后果。弥赛亚意识还表现在对乌境内俄罗斯族的保护上。乌克兰亲欧派在夺权之后很快废除了《国家语言政策基本原则法》，俄语从此不再是乌克兰的官方语言，这引起了乌克兰东部地区俄罗斯族人民的普遍抗议，认为这是亲西方政权对俄族人迫害的开始。俄罗斯政府对此事予以高调回应，在法案废除当日就召回了驻乌克兰大使以表达不满，普京在接受克里米亚入俄的演讲中也表示，正是因为乌东部局势不断的升级、在乌俄族人民权益得不到保障，自己才向联邦委员会申请对乌动武⁴。2019年乌克兰颁布的新语言法进一步限制了俄族人在日常生活中使用俄语的权利，作为回应，次日普京便颁布总统令要求简化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两地民众加入

¹ 资料来源：乌克兰“对话”网站：https://www.dialog.ua/blogs/194239_1573286050 2023年3月15日访问。

² 资料来源：凤凰新闻网站：<https://ishare.ifeng.com/c/s/7rQtiZlzVmF> 2023年3月15日访问。

³ 资料来源：文汇报网站：<https://wenhui.whb.cn/third/baidu/201812/20/231635.html> 2023年3月15日访问。

⁴ 资料来源：人民网：<http://www.people.com.cn/24hour/n/2014/0318/c25408-24660893.html> 2023年3月15日访问。

俄国籍的程序，并扩大了适用该法的乌克兰人民范围。尽管并非同样的国籍，在乌克兰境内讲俄语的同胞受到压迫的情况下，俄罗斯政府及时地出手，对身处困境的他们给予了慷慨的帮助和保护，这正是救世观念在俄乌冲突中的生动体现。

对俄罗斯而言，乌克兰的全面西化不仅是对东正教世界的背叛，更是触及到了俄罗斯建国合法性的关键领域，俄罗斯决心在东正教发源地同乌克兰争一争。同样是在接受克里米亚入俄的演讲中，普京称弗拉基米尔大公是在克里米亚城市克森尼索受洗的，“这使得俄罗斯成为一个东正教国家。它的这一精神遗产奠定了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共同文化、价值观与文明基础，注定使得我们三国的人民结合在一起¹。”2015年弗拉基米尔大公的千年诞辰也被拿来大加宣传，俄政府在博罗维茨广场为他立起了高达24米的雕像，还以他为主人公拍摄了《维京海盗》，这部电影的制作阵容和演员阵容都堪称豪华，制作成本也创造了俄罗斯电影史的新高，是一部不折不扣的“国家宣传片”。东正教的历史问题对于俄罗斯而言意义非凡，不仅仅是与乌克兰争夺谁是东正教“正统”，更重要的是要通过这些举措来保持自己在东正教世界里面的主导地位，为自己巩固传统势力范围区的外交努力提供精神上的支持。

（二）“横眉冷对”：受难精神和集权思想使俄罗斯藐视外部压力

2014年爆发的乌克兰危机是俄罗斯与美西方关系的一个重大转折点，自那时起到现在的九年时间里，特别是在2022年“特别军事行动”的开始引发新一轮高潮后，美西方一轮一轮施加到俄罗斯身上的制裁已经达到了8000多项，其中仅仅在2022年3月下旬的两周时间里就新增了1000多项。从政治到经济再到文化，从国际孤立到封冻财产再到设立禁飞区，甚至还有针对宠物的制裁和禁止使用字母“Z”的“文字狱”……堪称是史无前例的极限制裁，俄罗斯也超越了伊朗，“荣升”为全世界被制裁最严重的国家²。美西方的全方面制裁，目的显然是要通过破坏俄罗斯经济、促使俄社会崩溃，进而谋求颠覆普京政权。然而令世人没有想到的是，近十年的全方位“围剿”虽然给俄罗斯带来了巨大的损失，却没有将它完全打倒在地或者迫使它屈服，恰恰相反的是俄罗斯的态度随着制裁的增加而越来越强硬，无论是总统普京还是外长拉夫罗夫，再到发言人扎哈洛娃，俄罗斯向世界展示着自己的绝不妥协、绝不收手的强硬立场，不屈不挠得犹如一个浑身重伤但仍然坚持不肯倒地的拳击手一样，尽显“战斗民族”的铁血精神。

对于美西方极限的制裁力度，俄罗斯展现出了极限的忍耐力。忍耐从何而来？俄罗斯经济所固有的韧性固然是一个重要的因素。然而我们也不应该忽视东正教受难思想对于强化精神信念的作用。在俄罗斯学界有个流行的观点：“俄罗斯哲学是关于受难、关于顿悟的，是愿意为了真理而牺牲的哲学。”麦斯特·艾卡特更是言简意赅地说出了俄罗斯民族苦难意识产生的原因：“苦难是一匹载着你通向完善的快马。”只有通过苦难，人才能真正的打开那个隐藏在自己内心深处的伟大世界，正是这个伟大世界构成了人的内在品质³。需要指出的是珍视苦

¹ 资料来源：人民网：<http://www.people.com.cn/24hour/n/2014/0318/c25408-24660893.html> 2023年3月15日访问。

² 资料来源：中新网：<http://www.chinanews.com.cn/gj/2022/04-02/9718126.shtml> 2023年3月18日访问。

³ [俄]S.L.弗兰克著，李昭时译：《实在与人：人的存在的形而上学》，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9页。

难、拥抱苦难的思想在我国也很流行，但我们是将忍受苦难作为通向“凤凰涅槃”式美好结局的必经之路，而俄罗斯热爱的是苦难本身，即使身陷最艰难的逆境中，忍受苦难仍然是谁都夺不去的精神自由权利。如同伟大的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说，“我实在怕配不上这一路的苦难”，苦难是一种令人骄傲的财富、值得珍视的经历¹。库娜安精神也让俄罗斯人在西方的疯狂制裁面前充满了从容。如同俄罗斯天然气工业银行高管妮娜·罗德宾娜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这就像一场战争，刚开始的时候大家都手足无措。但是慢慢会适应，会在战争中找到一种生存方式²。”这代表了俄罗斯民众对于制裁之下艰难生活的普遍看法。

东正教的意识形态使得俄罗斯民众对于总统普京的乾纲独断有着超高的支持度，这显然也是分权思想主导下的西方世界所难以预料的。普京本人独特的人格魅力使他成为了民众心目当中的“硬汉”，人们就像过去敬畏沙皇一样敬畏着普京。西方企图通过制裁促使俄民众将普京打倒在地，然而令他们大跌眼镜的是，在一轮轮的制裁之下普京的支持率不降反升。全俄社会舆论研究中心的调查显示，乌克兰危机爆发一年后普京的信任度高达 65%，在“特别军事行动”大半年之后，2022 年 10 月普京总统的支持度达到了惊人的 81.1%³。疯狂的制裁带来的是爱国主义在俄罗斯的高涨，俄罗斯政府副总理米舒斯京指出：“俄罗斯人民越是感受到外国的制裁压力，他们就越不会抛弃自己的领袖。相反，他们愿意牺牲自己的利益来配合国家的政策实施……推翻普京政权的阴谋永远不会在俄罗斯得逞⁴。”俄罗斯民众对普京高度的信任源自于东正教内核的爱国主义和对国家元首的传统敬畏之心，这种心理在强大的国际压力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和巩固，也增强了普京总统代表民众与西方死磕到底的信念。

¹ 刘军梅著：《俄乌冲突背景下极限制裁的作用机制与俄罗斯反制的对冲逻辑》，载《俄罗斯研究》，2022 年第 2 期，第 62-88 页。

² 王笑笑著：《俄罗斯对经济制裁说“不”》，载《中国新时代》，2014 年第 9 期，第 44-45 页。

³ 数据来源：全俄社会舆论研究中心官网：<https://wciom.ru> 2023 年 1 月 23 日访问。

⁴ 资料来源：观察者网：https://www.guancha.cn/international/2022_03_01_628286.shtml 2023 年 4 月 1 日访问。

第七章 挑战与对策

一、当前东正教影响下俄罗斯外交的困境

（一）宗教复魅背景下西方的渗透与和平演变风险

自十月革命胜利一百多年以来，历经时代和政制的变迁，西方一直没有停止过对于俄罗斯东欧中亚地区的渗透与演变步伐。在东正教被严格打压的苏联时期，这种演变主要体现为利用先进的生产生活方式对人民产生潜移默化的腐化作用；而伴随着苏联解体、包括东正教在内的各种宗教的重新登堂入室，西方国家转而寻求在意识形态方面实行和平演变，具体表现为接近并利用东欧各国东正教会，挑唆激化其与俄罗斯的历史矛盾，引诱其敌视俄罗斯乃至造成东正教会内部分裂，以达到牵制俄罗斯的目的。2003年莫斯科教会主教阿列克谢二世在对高加索地区和爱沙尼亚宗教领导人访问中，就出现了剧烈的矛盾和争执，爱沙尼亚方面宣称要尽量减少与莫斯科教会之间的依附关系，事后莫斯科方面指责爱沙尼亚教会这一反常的表态背后有美国的唆使¹；又如欧盟和北约以接纳乌克兰为成员国作为诱饵，对乌克兰大谈条件、大搞渗透并促使其全面西化，使乌境内反俄情绪日益高涨；如前文所述2018年俄乌教会的决裂，根源在于10月11日君士坦丁堡牧首决定授予乌克兰东正教会自主教会的权利，恢复了被莫斯科教会视为分裂分子并予以解职的乌克兰主教的教职，由此加剧了俄乌矛盾并造成了整个东正教世界的震动²。东正教内部的矛盾与纷争被美国充分利用，成为其施压俄罗斯“人权状况”的得力工具。

由此可见，东正教对于俄罗斯外交的负面影响的确存在且不容忽视，如何克制西方对其的利用与和平演变风险是摆在俄罗斯执政者面前的一道难题。

（二）弥赛亚意识对俄罗斯国际地位的负面影响

如前文所述，东正教对俄罗斯外交政策的影响集中体现为普世主义的弥赛亚意识带来的民族优越感和济世使命感，然而这也对俄罗斯在国际上产生了不利的影响。基督教东西教会于11世纪正式分裂，在此后的一千年时间里，双方在包括合法性、话语权、信徒支持度等方面都存在着激烈的竞争，到13世纪面对蒙古鞑靼西侵的危机时，罗斯大公宁愿选择与野蛮部族合作抗敌，也不愿意团结信仰同源的欧洲人，就足以看出当时双方分歧隔阂之深。

苏联解体以后，新生的俄罗斯联邦曾经尝试过政治、经济和生活方式等方面走西化之路，然而西化过程步履维艰并屡有变故，究其原因就在于其齐腰学习的西欧在种种方面和俄罗斯的差距都过大，而宗教冲突以及由此引发的政治误判、文化冲突进而延伸到的军事敌对则更

¹薛凤伟著：《东正教对冷战后俄罗斯的影响》，载《西伯利亚研究》，2008年第2期，第58-63页。

²刘博玲著：《俄乌教会纷争引发的东正教世界的危机与应对》，载《世界宗教文化》，2021年第3期，第47-53页。

不用多提。这种分歧不但没能弥合，近些年甚至有加大的趋势，这更加剧了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敌意与仇视。面对西方的敌视，弥撒亚意识绵延出的强烈的自豪感使俄罗斯走上了以硬碰硬的道路，如出兵叙利亚、占领克里米亚、发动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等，都是俄罗斯对于西方的封锁与制裁作出的强硬回应，而西方则趁机对俄罗斯发起了空前的制裁和全方位的孤立行动，这些都是俄罗斯国际地位边缘化的体现。

二、俄罗斯的应对措施

（一）重建俄罗斯思想

冷战后俄罗斯步履维艰的西化之路证明了照搬西方的东西在俄罗斯是没有市场的，俄罗斯需要做的是立足于自身，建设扎根本土、适应本国国情的思想意识形态。如：针对西方标榜的自由民主思想，普京上台之初既提出了“可控民主”的政治理念，在随后沉淀为“主权民主”。到了 2005 年，为了反驳西方对于俄罗斯总统和议会选举的批评，消减别斯兰人质事件带来的政治压力并抵御“颜色革命”，普京又将“主权民主”塑造为“可控民主”理念的官方意识形态表述。针对美国有关于宗教人权的攻讦，普京明确表示这是俄罗斯的自身事务。遵循宗教平等原则处理宗教事务是俄宪法明文规定的内容。这样就使得俄国内的各宗教力量得到了平衡，宗派之间的分歧也减少了。普京对待各种宗教都一视同仁，彰显俄罗斯有能力处理内部各宗教教派之间的分歧。通过调理作为主导的东正教及其他宗教的关系，对于重塑俄罗斯国家形象大有益处，同时也为俄罗斯外交赢得了更多主动权。

俄罗斯进行思想重建的直接行动是为了回应西方的“自由民主”而针锋相对地提出了自己的“主权民主”思想。作为现代俄罗斯价值体系的意识形态基础，主权民主思想是国家复兴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普京在 2007 年面向联邦会议的国情咨文当中指出：“对于俄罗斯的发展而言，人民精神上的团结以及道德准则的一致与政治和经济的稳定同样重要……不允许外来势力干涉俄罗斯的事务。”他表示，“不是所有人都愿意看到俄罗斯的和平发展，有的人利用伪民主的口号，想让我们回到不久之前的状态；有的人还想像以前一样去挥霍我们全民族的财富，掠夺人民和国家；更有的人希望我国丧失经济上和政治上的独立性。¹”主权民主论在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各领域等已产生深刻的影响，在宗教领域表现为俄罗斯境内各种宗教都在重新寻找定位，充分地发展自己的文化。

东正教会一如既往地成为了“主权民主论”忠实的支持者、捍卫者和践行者。事实上，在 90 年代俄罗斯西化失败、“休克”疗法导致国民经济遭重创、前途迷茫、民众恐慌之时，东正教就配合政府呼吁人民不要再对西方的那套价值观趋之若鹜，而是要向民族传统回归。时任全俄罗斯大牧首阿列克谢二世呼吁信徒乃至全国人民认清西方文明“只有利益，没有精神”的本质，与那种强权政治和利己主义划清界限²。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东正教在当代俄

¹ 普京：《千年之交的俄罗斯》，载《普京文集：2002-2008》，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第 16 页。

² Ирина Каргина, “Религия и конфликт: современные вызовы и теоретико-методологические перспективы социологии религии”, Москва : РОССПЭН,2007,p.23.

罗斯和社会中起到了独特的作用，那就是它的精神特质成为了抵御西方影响的重要一环，东正教会成了俄罗斯民族独特性的重要捍卫者。

（二）巩固势力范围，拓展面向非西方的外交

在西方的敌视和封锁短时间之内难以打破的情况下，俄罗斯外交的出路就在于拓展面向非西方的外交。冷战结束后俄罗斯不但自身伤筋动骨、转型艰难，还遭遇了东欧剧变、北约东扩带来的战略空间急剧缩减，急需寻求新的外交突破口以缓解压力。冷战结束后日益明显而不可逆转的多极化趋势、中国印度巴西等为代表的新兴国家的不断崛起为俄罗斯拓展面向非西方的外交提供了机会，成为其努力打破自身边缘化地位、改善与各国关系的重要手段。近年来俄罗斯与第三世界国家的交往进一步增多，文化外交欣欣向荣，物质与文化外交相得益彰。

东欧和中亚一直被俄罗斯视为是自己的传统势力范围，这些地区的白俄罗斯、乌克兰、哈萨克斯坦等国家与俄罗斯有着相同的东正教信仰，他们俄罗斯国界周边构成一圈“缓冲区”，对于地缘上一向缺乏安全感的俄罗斯而言是至关重要的安全底线，针对他们所开展的外交也一直是俄罗斯的重中之重。在过去的30年里，俄罗斯政府一直不遗余力地积极推动与这些国家签订共同安全条约和经济合作文件，其最终目的是实现俄罗斯主导下的后苏联地区政治经济军事一体化。苏联解体后立即建立起来的“独立国家联合体”自不必说，近些年来俄罗斯努力经略促成的“俄白同盟”“欧亚经济共同体”等组织也是俄罗斯追寻苏联旧日荣光、强化东正教意识形态下“帝国架构”的直接表现。以俄白关系为例，俄罗斯非常注重通过和白俄罗斯“套近乎”来推动双方关系走向新高度，双方的领导人每次见面都以“亲密的东斯拉夫兄弟”自居；而东正教也成为了双方之间联系的重要心灵纽带，和俄罗斯类似的是，东正教在白俄罗斯也是占主流地位的宗教，东正教信徒数量占据全国总人口的近一半¹。共同的信仰塑造了两国相近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也拉近了两国民众间的心理距离，成为俄白一体化进程中重要的影响因素。

此外，宗教外交也可以发挥其特有的作用，成为解决外交冲突的独特渠道。当俄罗斯与西方国家之间关系持续冲突而看不到调和的希望时，教会可以成为一个独特的沟通平台，从而有助于更加快速地打破僵局。宗教有其自身的优势，有时可以成为打破僵局的新要素。

¹ 资料来源：白俄罗斯政府官方网站：<https://www.belarus.by/en/about-belarus/religion>。访问时间：2023年3月8日。

结论

通过上述的论证我们可以看到，东正教对于俄罗斯的影响表现在方方面面，正是因为东正教强大的精神力量和厚重的文化寄托，这个国家在岁月长河中虽然饱经沧桑、历经磨难却保持住了自己独有的那份坚韧；同时，在俄罗斯外交活动中，作为精神内核和意识形态主导的东正教始终作为一只“看不见的手”发挥着独到而无处不在的作用。在“第三罗马”理念和弥赛亚意识作用下，俄罗斯民族认识到了自己东西方兼具的“神圣使命”，在这种使命感的感召下，俄罗斯民族不断地向东西方进取，在与外界的历史交往中，不断地强化自我意识，从而形成俄罗斯国家对外政策的基石。使俄罗斯人形成了神选民族的形态，由此衍生出对威权的依赖与容忍，二者的共同作用使俄罗斯外交呈现出相当明显而独特的“大国主义”风格。

东正教与俄罗斯同生共长，相伴相随，二者构成了一体两面的关系。回顾东正教在俄罗斯大地的千年发展史，可以看出它虽历经沉浮，但一直都在俄罗斯民族的心灵世界中占据着主导地位，正如别尔嘉耶夫所言：“与东正教脱离了关系的俄罗斯人，其心灵类型依然是东正教式的¹”，以至于历代的领导人——无论他们是东正教的忠实信徒还是坚定的无神论者——最终都选择了依赖和仰仗东正教的力量为自己服务。今天，俄罗斯教会和政府努力寻找着各自利益的交汇点而彼此靠拢，尽管政教分离仍然是明明白白地写在俄罗斯宪法里的金科玉律，但二者的利益却在不断趋同。国家的走出低谷和积极进取的政策取向为东正教会自身的发展注入了一针强心剂，而东正教的独特的精神力量、教会积极配合政府的态度也为政府提供了心理支持。可以预见的是，东正教将会在俄罗斯外交政策的制定和外交活动的执行中继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一方面，东正教的强大凝聚力将有效的助力俄罗斯对外政策的制定与执行，通过持续不断的感召人民的认同感和爱国主义情节，政府可以减少政策执行过程中的阻力，也有助于俄罗斯在国际社会争取更多利益，追求地区主导权和对世界事务的参与权。在处理与其他大国的关系时，俄罗斯将采取更加积极的措施来保护本国的利益。另一方面，东正教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带来的隐患也需引起关注。

一国的外交政策是其内政的延续，一国的政治生态充分地反映着这个国家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对于俄罗斯而言，东正教并不仅仅是一种宗教，它还是俄罗斯民族意识的内在构成，是推动俄罗斯社会进程的精神动力与精神资源。伴随着中俄关系的空前密切，对俄罗斯的研究在国内也逐渐发展和深入。在研究俄罗斯外交政策的背景、特点和缘由时，不妨对其背后的包括东正教因素在内的精神文化多加以考察，对于我们加深对俄罗斯外交政策的理解乃至做出一定的预测都大有裨益。

¹ [俄]别尔嘉耶夫：《俄罗斯的命运》，南京：译林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137 页。

参考文献

一、外文文献（按首字序排列）

- [1]О.Л.Церпицкая,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е Русской Православной Церквей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в мировом сообществе, Издав-во С.- Петер. уни-та, 2006.
- [2]Юрий Рябых, Внешне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ориентиры Русской православной церкви(1991-2000), Pro et Contra, Том6, №4, Осень,2001.
- [3]Под Ред. В.Е. Бонго, Д.К. Бурлака, Православие: pro etcetera, Некоммерческое партнёрство «Научно-образовательное культурологическое общество» ,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2012.
- [4]С.Б.Филатов, Религия и общество (очерки религиозной жизни современной России), Летний сад, Москва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2002.
- [5]С.Б.Филатов, Религия и общество (очерки религиозной жизни современной России), Летний сад, Москва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2002.
- [6]Николай Митрохин, Русская 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Церковь: современное состояние и актуальные проблемы, Новое литературное обозрение, Москва, 2006.
- [7]О.Е.Казьмина, Русская 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Церковь и новая религиозная ситуация в России,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Москов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2009.
- [8]В. Павленко, Византия и Россия: духовное и историческое наследие, 《Обозритель--observer》 8/2012.
- [9]Л.Ф. Болтенков, В. И. Шевелев, К вопросу о взаимовлиянии Русской Православной Церкви и институтов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сти (IX–XVI вв.). 2010.
- [10]Тенгиз Палаузе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й Центр Гео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Грузия; Турнике Шарашенидзе —Грузинский Институт Общественных дел, Грузия; Андрис Кудара —Институт Восточно-европейски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Латвия; Алексей Герань —Национальны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 «Киево-Могилянская академия» ,Украина; Сергей Здору—Национальный институт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и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Украина.2013.
- [11]Christopher A. Hall, “Truth, Pluralism, and Religious Diplomacy: A Christian Dialogical Perspective”, in Robert A. Semple and Dennis R. Hoover, eds, Religion and Security: The New Nexu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anham, MD: Rowman and Littlefield Publishers, NC. 2004.

二、中文期刊论文、报纸文章、学位论文（按首字序排列）

- [12]安启念：《俄罗斯向何处去——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哲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 [13]陈黎阳：《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民族主义》，重庆：重庆出版社，2006。

- [14]戴桂菊:《俄国东正教会改革:1861-1917》,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 [15]戴桂菊主编:《当代俄罗斯》,北京:外语教学与音像出版社,2008.
- [16][俄]谢尔盖·布尔加科夫著,徐凤林译:《东正教——教会学说概要》,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 [17][俄]德米特里·利哈乔夫著,焦东健、董茉莉译:《俄罗斯千年文化:从古罗斯至今》,北京:东方出版社,2020.
- [18][俄]德米特里·利哈乔夫著,杨晖、王大伟译:《俄罗斯思考》,北京:军事谊文出版社,2002.
- [19][俄]赫克著,高骅、杨滨译:《俄国革命前后的宗教》,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
- [20][俄]耶夫多基莫夫著,杨德友译:《俄罗斯思想中的基督》,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
- [21]范建中等:《当代俄罗斯:政治发展进程与对外战略选择》,北京:时事出版社,2004.
- [22]柳思思:《外交的文化阐释——俄罗斯卷》,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2.
- [23]鲁毅:《外交学概论》,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
- [24][美]彼得·伯格等著,李俊康译:《世界的非世俗化——复兴的宗教及全球政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 [25][美]亨利·基辛格著,顾淑馨译:《大外交》,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
- [26][美]斯蒂芬·范弗埃拉著,陈琪译:《政治学研究方法指南》,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 [27][美]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著,东方编译所译:《大棋局——美国首要地位及地缘》,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 [28]潘一禾:《文化与国际关系》,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5.
- [29]庞大鹏:《观念与制度: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国家治理(1991-2010)》,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 [30]王云龙:《现代化的特殊性道路:沙皇俄国最后60年社会转型历程解析》,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 [31]杨翠红:《俄罗斯东正教会与国家政权关系研究(9-18世纪末)》,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11.
- [32]张百春:《风随着意思吹:别尔嘉耶夫宗教哲学研究》,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1.
- [33]张钦文:《转型期俄罗斯国家意识形态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
- [34]张雅平:《东正教与俄罗斯社会》,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 [35]张雅平:《东正教与俄罗斯社会》,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 [36]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主编:《中外关系史论丛:多元宗教文化视野下的中外关系史》,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12.
- [37]安启念:现代化视阈中的俄罗斯文化.载《浙江学刊》,2007年第3期,第26-34页。
- [38]陈乔之,王文:试论俄罗斯政治文化对其外交战略的影响.载《东南亚纵横》,2005年第2期。
- [39]戴桂菊:东正教与俄罗斯改革.载《东欧中亚研究》,2001年第2期,第54-60页。
- [40]戴桂菊:中国的俄罗斯东正教研究.载《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6年第5期。
- [41]邓南凤:俄罗斯外交的现实主义传统.载《广西教育学院学报》,2014年第2期。

- [42]耿海英:多极的俄罗斯精神结构——别尔嘉耶夫论俄罗斯精神. 载《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
- [43]蒋莉:东正教在俄罗斯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及影响. 载《现代国际关系》,2002年第9期。
- [44]金龙云:试析中俄关系中的东正教因素. 载《东北亚研究论丛(长师大)》,2018年第1期。
- [45]雷永生:宗教沃土上的民族精神——东正教与俄罗斯精神之关系探略. 载《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1998年第1期。
- [46]李立永,徐茜:俄罗斯国民性格的二律背反及成因简析. 载《俄罗斯研究》,2004年第1期。
- [47]林精华:无处不在的身影——东正教介入俄罗斯社会政治生活试析. 载《俄罗斯研究》,2010年第5期,第108-127页。
- [48]柳居:普京与叶利钦的治国之道. 载《当代世界》,2001年第3期。
- [49]孙雪森:从俄罗斯宗教哲学看俄罗斯人的苦难情结. 载《牡丹江大学学报》,2011年第20(02)期。
- [50]涂怡超,赵可金:宗教外交及其运行机制. 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9年第2期。
- [51]王春英:建构中的俄罗斯新意识形态. 载《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10年第5期。
- [52]魏熊生,汪宁:俄罗斯对叙利亚政策中的东正教因素. 载《俄罗斯研究》,2020年第1期。
- [53]邢悦,王晋:“弥赛亚意识”与俄罗斯“大国主义”外交. 载《国际政治科学》,2017年第2卷第1辑。
- [54]薛凤伟:东正教对冷战后俄罗斯的影响. 载《西伯利亚研究》,2008年第2期。
- [55]俞思念:东正教在俄罗斯的复兴. 载《俄罗斯研究》,2002年第2期。
- [56]张梅:当代俄罗斯东正教复兴情况研究. 载《西伯利亚研究》,2008年第1期。
- [57]张亚娜:普京重构爱国主义价值观:理论基础与实践路径解析. 载《西伯利亚研究》,2019年第46卷第4辑。
- [58]赵华胜:评俄罗斯转向东方. 载《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6年第4期。
- [59]赵兴明:大俄罗斯主义述论. 载《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2005年第6期。
- [60]宫世霞:当代俄罗斯外交学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外交学院国际关系专业,林军教授指导,2011年5月。
- [61]黄元:东正教对俄罗斯对外政策的影响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外交学院政治学理论专业,杨帆副教授指导,2015年3月。
- [62]杨春娟:试论俄罗斯独立后东正教的复兴(硕士学位论文),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周尚文教授指导,2008年5月。

